

2012 NO2

滿鐵研究

Mantie Yanjiu



中國近現代史史料學學會滿鐵資料研究分會

目錄

Contents

- 01** 卷首语 吃水不忘挖井人
特稿
02 苏崇民 《满铁史资料》编辑的经过
06 苏崇民 日本侵占时期的东北经济
12 苏崇民 关于满铁与拉蒙特借款交涉

論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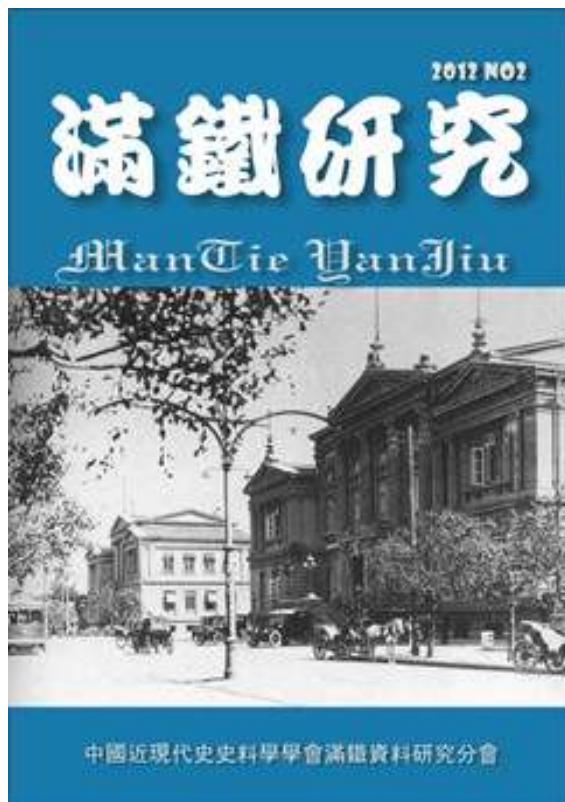
- 14** 谢学诗 日本对战时中国的认识
26 冷绣锦 大图馆藏满铁文献之研究价值
33 王小川 大连图书馆满铁文书解题

動態

- 37** 许 勇 中日美满铁史研究机构及学者

書評

- 42** 许 勇 关梦觉、邵敬勋、苏崇民教授



<http://blog.sina.com.cn/mantieyanjiu>

滿鐵研究

MAN TIE YAN JIU

《满铁研究》编委会

主任：关忠良 魏海生

顾问：国 林 葛剑雄 张本义

沈友益 李海绩 李东翔

编委：关忠良 魏海生 韩宝明

郑 兰 刘建设 许 勇

主管：满铁资料研究分会

主办：北京交通大学图书馆

主编：韩宝明

编辑：《满铁研究》编辑部

邮箱：yxu1@bjtu.edu.cn

地址：北京交大图书馆 611 室

邮编：100044

电话：13718351392

期次：2012 No2 (总第 14 期)

日期：2012 年 6 月 28 日

网址：lib.njtu.edu.cn/mt/mtyj.html

版權聲明

《满铁研究》刊载之文字和图片，其版权归作者所有。凡转载、摘编本刊内容，请注明“转摘自《满铁研究》”，并按规定向作者支付稿酬。否则本刊将追究违反规定者的法律责任。

徵文啓事

《满铁研究》是一份由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满铁资料研究分会主管，北京交通大学图书馆主办的史学季刊。传递信息、交流学术，揭示历史、畅想未来是《满铁研究》的办刊理念和既定目标。本刊设简讯、动态、特稿、书评、文摘、论坛、图库、译林、杂俎等栏目。欢迎海内外满铁研究领域的专家和爱好者为本刊赐稿。

執行主編：許勇

卷首語

吃水不忘挖井人

现如今知道“满铁”的国人很少，知道《满铁研究》的就更是凤毛麟角了。就是这本几乎无人喝彩，近乎弹尽粮绝的无名杂志，日前先是受到名家的肯定，接着三篇大作邮来，如此“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居然真让本刊给遇上了。这位名家就是我国满铁研究的资深学者、《满铁史》的作者、吉林大学日本研究所的苏崇民教授。

「《满铁史资料》编辑的经过——缅怀关梦觉和邵敬勋两位前辈」是一篇回忆文章，苏教授不仅披露了编辑《满铁档案资料汇编》过程中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还介绍并缅怀了满铁研究创业时期他的两位良师益友。

「日本侵占时期的东北经济——统制与掠夺」是苏教授的另一篇力作，他以经济学家的视角，对日本侵占时期的东北经济，包括满铁、满业、垄断资本、日本财阀等，进行了深刻的剖析，进而揭露日本侵略者名为“开发”，实为掠夺的豺狼本质。

「关于满铁与拉蒙特借款交涉」亦为苏崇民教授所撰，该文虽篇幅不长，但却极具画龙点睛、抛砖引玉之意义。“借款”与发轫时期的中国铁路，关联度甚高，谈论“西原借款”的大有人在，而涉及满铁的借款，尤其是拉蒙特（美国金融家、曾任摩根财团总裁）借款，研究者却很少。苏教授可谓是仙人指路，为满铁研究独辟了一条蹊径。

关于解学诗先生本刊曾予专文介绍，他和苏崇民先生一样，同为中国满铁研究的领军人物。解老尤擅“满铁调查机构”之发掘，著有《隔世遗思——评满铁调查部》，「日本对战时中国的认识」一文，同样也是围绕着满铁的各类调查展开的。

「大连图书馆藏“满铁”文献之研究价值」的作者冷绣锦研究馆员，对满铁及其附属地图书馆素有研究，著有《“满铁”图书馆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1)，该文对昔日满铁大连图书馆的藏书体系及今天大连图书馆珍藏的满铁文献皆有详尽介绍。

「中日美满铁史研究机构及学者概览」主要介绍中国大陆和台湾、日本、美国从事满铁史及相关研究的学者和他们的著作，国内诸如苏崇民、解学诗等专家的情况，因已有或另有专文介绍，故不再赘述。

「关梦觉、邵敬勋、苏崇民教授简介」是为配合苏崇民教授的文章而编，旨在让读者对三位满铁研究的前辈多些了解。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悬挂着满铁分会的招牌，扫描着满铁资料的故纸，引用着满铁专家的文章，编纂着满铁研究的杂志，今天的你我一定要记住那句老话哟！

When you drink the water, think of those who dug the well.



《滿鐵史資料》編輯的經過

——緬懷關夢覺和邵敬勛兩位前輩

苏崇民¹

《满铁史资料》终于全部出版了，虽然改头换面用了《满铁档案资料汇编》的名字，但它毫无疑问就是 1958 年国家下达给东北人民大学的科研任务《满铁史资料》。从 1958 年立项，到现在历经半个多世纪，它终于出版问世，作为自始至终参加编辑并被列为主编之一的我来说，总算去掉了那一桩心病，对有关方面也算有了个交代。

文革前《满铁史资料》本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主管的科研项目，学部还批准了中华书局的出版申请。文革后，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撤销，新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声称不继承原学部的业务。于是，这个原国家任务在国家一级就失去了依靠，而随着出版形势的变化，中华书局拿不到补贴，稿件就被压在了阴山背后。一晃就是 20 多年。

在编辑《满铁史资料》的过程中，有很多人做了无声的贡献，耗费了心血，付出了年华。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方面的情况，我不清楚，但是，吉林大学方面，我知道先后参加这项工作的有 20 多人，这还不算校外聘请的精通日文的临时翻译十余人。

下面将我亲身经历的任务下达情况、它和关梦觉及邵敬勛两位前辈的关系以及编辑人员调配的情况做一简略回忆。

1958 年 4 月某日，我被通知到系（东北人民大学经济系）里开会，当时到场的有校党委来的领导、校领导、校科研处处长、系正副系主任、各教研室主任、党总支书记以及经济史教研室的教师们。党委的领导传达了文件，是高教部转发的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将编辑《满铁史资料》和《东北垦殖史资料》这两项有关东北的长期规划任务下达给东北人民大学（随后不久改称吉林大学）的文件。任务是国家科委委托高教部下达的，明确是下达给东北人民大学。当时，东北人民大学直属高教部，因此，这次任务下达并没有经过吉林省，而且，当时吉林省也还没有社会科学院这样的机构。

东北人民大学将这两项任务交给经济系，这次会上又明确由系主任关梦觉教授亲自挂帅。会上，关梦觉主任宣布《满铁史资料》编辑组成员为副系主任邵敬勛教授、解学诗讲师和我（苏崇民，年初刚被定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撤销讲师职务）三人，由解学诗任组长（当时解是团员、积极分子，而邵则刚被取消预

¹ 苏崇民，1931 年生，辽宁新民人，吉林大学日本研究所教授。

备党员资格、内定中右)。这就是说，三人都是关梦觉点的将，从那以后，三人的命运就和《满铁史资料》捆绑在一起。

当时邵、解二人还在农村劳动锻炼，未能参加这次会议。6月，他们相继回城，编辑工作正式开展。三人之间作了分工，解为组长照顾全盘并负责路权、附属地、调查和华北等偏重政治侵略的部分；邵负责抚顺煤矿、石油和鞍山钢铁等的媒铁掠夺；我负责满铁设立、铁路交通、农工商子公司网和资金等偏重经济侵略部分。

同年8月，中国科学院成立吉林分院并设立经济研究所，由吉林大学经济系主任关梦觉兼任所长，同时，邵敬勋和解学诗也由吉林大学转入研究所，这样以来，《满铁史资料》的编辑工作自然而然地放在了研究所进行（1961年经济研究所改为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经济研究室，关梦觉为副所长）。于是这个吉林大学承担的国家任务，顺理成章地成为以省研究所为主导的科研项目。由于始终是关梦觉挂帅，编辑组也大体依旧（只增加了翻译和年青成员），所以这种演变毫无障碍。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1964年，也就是说以解学诗为组长的满铁编辑组从1958年工作到1964年，这期间虽然吸收了年轻人，翻译人员也有增补，但三人分工的基本格局，没有变化。资料的收集在一起，资料的使用也在一起，基本上不分彼此，合作无间。

进入1964年，吉林大学经济系党总支就《满铁史资料》的归属问题提出异议，于是，系里将我召回，并乘成立日本经济研究室之机，将《满铁史资料》的编辑工作作为研究室的中心任务。于是，原来由我分担的部分，就成为吉林大学经济系日本经济研究室承担的任务，而原来由解、邵二人分担的部分，当然留在研究所成为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承担的任务。从此，原编辑组一分为二，收集的资料也被分成两份，原来主要由我收集和使用的资料，也随我搬回日本经济研究室。从此，出现了两个编辑组，各自独立编辑所承担的部分，于是《满铁史资料》正式明确为两家合编。研究所方面，仍然由解学诗主持。吉林大学参加编辑的人员则由我1人增加为7人，其中教授1人、讲师5人，另有翻译和资料员，由日本经济研究室主任任文侠负责主持。两个编辑组又统一由关梦觉直接领导，有统一的指导思想和编辑大纲，直到1966年文革动乱，编辑工作被迫中断。

1970年，吉林省革命委员会决定恢复《满铁史资料》的编辑工作。为此，吉林大学新设日本研究所，《满铁史资料》被划归日本研究所历史研究室，改由陈本善负责，原编辑只余苏崇民1人，另有1人去世5人退出，同时又新增编辑4人及配备翻译和助手。吉林省方面也恢复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1979年升级为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满铁史资料》编辑工作仍然由解学诗主持，不过它被放在日本研究室。两者都脱离了从新担任吉林大学经济系主任的关梦觉的掌握。从

此，关梦觉被排除在《满铁史资料》编辑工作的领导之外。

关梦觉是国内知名的经济学家，爱国民主人士，在抗日战争时期，发表过很多揭露日本经济侵略的论文。由关梦觉挂帅编辑《满铁史资料》是很恰当的人选。从 1958 年立项起到 1966 年文革动乱开始的 8 年间，关梦觉教授对《满铁史资料》抓的很紧，经常召开编辑会议，研究编辑的进度，解决存在的问题。他的指导思想是要求以编书的标准编辑资料，要将该资料编成为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控诉书、判决书，要将满铁的侵略定为铁案。强调要用按语批判和揭露帝国主义的罪行，并对敌伪形成的资料彻底消毒。

可惜，处于当时极左思潮统治下，为了避免犯政治错误，过于强调按语的重要和对资料的消毒，编者精力主要放在分期、体系、标题特别是按语上，而对于档案和一手资料的占有，则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和下足够的功夫，使编辑工作不可避免地走了弯路。文革后期编辑工作恢复后，关梦觉又被剥夺了《满铁史资料》编辑工作的领导权。未能亲手纠偏，实在是令人惋惜。不过作为长时间《满铁史资料》编辑工作的灵魂和挂帅人物，他的影响不容忽视，他的功绩也是不容抹煞的。当此《资料》任务结束之时，回忆以往，也算对关梦觉先生的一丝怀念。

再谈一下邵敬勋先生，邵敬勋先生是经济系主任关梦觉指定的《满铁史资料》三人编辑组成员之一。他当时是经济系副系主任，又是成名的教授，可说是德高望重，按说编辑组长应当非他莫属，不过，当时正是反右斗争的结尾阶段，他刚被取消预备党员资格，在内部被划为中右，于是这个组长就与他无缘了。好在邵敬勋先生对此坦然处之。毫无怨言。

邵敬勋先生是一位有长期革命经历的老前辈，如果我的听闻不错的话，在一二九运动时他是学生领袖之一，是当时北京师范大学学生会主席，是平津学生南下请愿的组织者之一。后来他虽然丢了组织关系，却始终追随革命，同党的地下工作者保持联系。1949 年在西北解放前后参加了西北农学院的护校斗争，同年 6 月出任该校解放后的第一任院长。

1950 年，邵敬勋先生回到东北，同年 3 月就任东北财政专门学校（1950. 3—1952. 11）校长，1952 年 11 月，该校并入东北财经学院，邵敬勋任教务长，直至 1954 年 9 月。

此后，邵先生曾从新入党，并于 1956 年转入东北人民大学经济系任副系主任。1957 年，在反右斗争的形势下，被取消预备党员资格。

邵先生平易近人，对于当时戴着右派分子帽子的我也没有半点歧视。下班时总是叫我一起走，天长日久，我们就成了忘年交。对我，他是亦师亦友。他甚至不避风险，带我去见他的一些老朋友，都是很有名望的人士或省级领导。

在《满铁史资料》编辑组，邵先生分担的是满铁对东北的煤炭和钢铁的掠夺，

煤炭包括满铁的抚顺煤矿、烟台煤矿、新丘煤矿以及后来的满洲炭矿株式会社，还有抚顺煤矿的页岩油；钢铁包括鞍山附近的铁矿、鞍山制铁所和后来的昭和制钢所、东边道铁矿；资料是从攫取权益开始，包括掠夺式生产、剥削工人以至工人的反抗斗争，等等。

邵先生重视搜集原始资料，强调资料的不可分割性，对编资料时的分期不太赞成，对按语和消毒持消极态度，在当时的极左思潮下，难免被扣上客观主义的帽子。文革中更吃了不少苦头。

为搜集资料邵先生不顾高龄的身躯和行走不便，亲自多次跑大连、北京、沈阳、鞍山、抚顺的档案馆和图书馆。从1958年到1966年，整整8年，邵先生的全部精力都灌注在这些资料上。为这部资料的最后完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文革后期，吉林省革委会决定恢复《满铁史资料》的编辑工作并为此恢复了已被撤销的省哲学社会科学院。不过，邵先生却迟迟未被召回。甚至还向他提出了调回后立即办理退休手续的条件，后来，将他调到了哲学（？）研究室，只是，没有逼他立即退休。可是，《满铁史资料》的编辑工作，当时是放在日本研究室。于是，邵先生和他所编的资料被分离了，他从《满铁史资料》的编辑名单上被排除了，最初参加编辑的三人少掉了一个。

所幸，邵先生犹有余热可以发挥，除发表有关生产力方面的文章外，还出版了《近现代外国经济学述要》一部专著。

最令人欣慰的是，当邵老即将弥留之际，得悉他丢失组织关系一事，得到解决，失去几十年的党籍得以恢复，这是他终身念念不忘的大事。没有什么比这个更让他高兴的了。

此时此刻，缅怀起邵敬勋先生以及曾经为《满铁史资料》的编辑工作付出辛劳的人们。仅以此文聊表思念。

日本侵占時期的東北經濟

——統制與掠奪

苏崇民

从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到 1945 年“八·一五”日本投降，中国东北处于被日本侵占的所谓伪满洲国时期。

日本侵略者在“开发”、“建设”的招牌下，干着侵占、掠夺、榨取和奴役的勾当。他们侵吞东北的财富，掠夺东北的资源，奴役东北的人民，榨取东北人民的血汗，将一个富庶的地区变成人间地狱。

日本在东北的经济活动，可以概括为两个词四个字，即“统制”与“掠夺”。后者，被日本御用文人美化为“开发”。

经济统制是日伪自始至终坚持的一种制度。统制的范围不断扩大，统制程度不断加深，从生产到流通，从工业到农业，从金融到外贸，从产品到劳动力，无所不包。可以说已经达到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能达到的极限。

经济掠夺是日伪贯彻始终的动机、目的和结果。不论统制、开发、还是计划、投资，都是为了经济掠夺。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武装占领东北，炮制傀儡政权，是东北沦为殖民地的开端，也是东北沦为殖民地的决定性条件。日伪实行的经济统制。即利用其炮制的伪满洲国政权，以国家名义对东北经济实行强制的干预和严格的管理，以实现其侵占的目的。

伪满的经济统制实质上是为日本垄断资本主义服务的，是凭借政治权力的强制参与，以弥补其资本力量的不足，用以保证日本垄断资本对东北经济的全面垄断，并在某种程度上对东北经济进行殖民地化的资本主义改造。日本侵略者的方针是所谓“日满融合”和“日满一体化”，使东北经济从属于日本，并且变东北为其扩大侵略的战争基地。日本知名学者殖民地问题研究专家浅田乔二先生曾经精辟地指出：“满洲经济的变迁就是由满洲中心经济向日满一体化经济，进而由日满中一体化经济向日本中心经济发展。从另一方面看乃是由国家建设经济向国防经济，进而向战争经济进展者。是由农业国原料国经济向自给自足经济进展者，由对日依存经济向对日供献经济进展者。”

日本侵略者制定了为其自身利益及其侵略目的服务的经济政策，利用伪满政权，盗用国家的名义，强制推行。策划和制定政策的机关，先是关东军特务部和满铁经济调查会，后来是伪满国务院总务厅。批准这些政策的则是日本政府和日本军部。从政策的起草到决定，完全由日本人一手包办。伪满的汉奸大臣们只能在事后起个橡皮图章的作用。

“九一八”事变前，东北是属于资本主义初步发展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对日本的强权的经济侵略，东北当局鼓励民族资本进行了有效的抵制。日本占领后，没收从而消灭了东北的原奉系官僚资本，损害了中小民族资本。反之，日本资本得到极度扩张，占居绝对优势，并驱逐和排挤其他外国资本，垄断了国民

经济所有一切主要部门，事实上左右着东北经济的发展，使东北完全成为日本的经济附庸。

日本在东北的资本按其来源及支配体系可以分为国家资本系统、金融资本系统、产业资本系统、地方财阀系统和中小私人资本等几个类型，在它们相互之间也存在着相互渗透、依附和隶属、竞争和对抗等种种复杂关系。

国家资本系统是指国家资本占支配地位的企业体系，国家资本的主要代表是满铁。满铁股份的半数由日本政府持有，其余的股份则散在几万名民间股东手中，这些股东从日本皇室直至各种工商企业家，几乎囊括了日本的全部富豪。他们之中握有股份最多的还是以四大财阀为代表的日本金融资本。满铁的公司债也主要来源于日本金融资本。所以，在满铁资本中起支配作用从而决定其性质的是国家资本，而在国家资本的支配下却有一个数量上更大得多的私人资本，这些私人资本主要是靠日本金融资本搜罗提供的。此外，满铁还通过参与制，投资和持股支配着一个包括几十个子公司的关系公司网。在这些公司中，满铁资本与伪满国家资本和日本私人垄断资本建立起联合、依赖以至支配关系。除满铁外，属于日本国家资本系统的还有朝鲜银行、东洋拓植公司、满洲电信电话公司、满洲拓植公社以及后来的日本制铁公司、帝国燃料兴业公司等，它们也与伪满国家资本和日本私人垄断资本建立了各种联系。

这些日本国家系统的资本直接控制了东北的交通、通讯、金融、移民以及钢铁和合成燃料事业。可见，在东北的日本资本中，日本国家资本占有关键地位起了主导作用。

日本在东北的私人垄断资本包括以三井、三菱等老财阀为代表的金融资本系统，以日产系为代表的新兴军需产业资本系统，还有以大仓、浅野、日窒为代表的地方或二流财阀资本系统。老财阀和地方财阀早在“九一八”事变前就在东北设有分支机构，从事商贸和投资活动。事变后，由于关东军推行经济统制政策，限制企业的自由经营，一度影响了它们对东北直接投资的积极性，主要采取的是间接投资形式，如认购满铁和伪满洲国的债券，收购满铁股份，参与“国策”投资等较少风险的投资途径。从 1937 年起，投资明显扩大，不过由于它们的投资重点是放在华北和华中，在东北的直接投资仍限于同它们的事业和技术有密切联系的有限领域。

新兴军需产业资本日产系进入东北是在 1937 年年底，它的移植导致了满洲重工业开发公司的设立，从而结束了满铁对重工业多年的垄断。日产系进入东北是日本陆军、日本对满事务局、伪满日本人官员和日产系代表鲇川义介紧密勾结的结果。满业的成立说明日本军部与私人垄断资本的高度结合，说明伪满政权成为日本私人垄断资本攫取高额利润的得力工具。满业成为仅次于满铁的第二位日本资本。满业成立后也以发行公司债为其进一步筹措资金的主要办法。无论是满铁还是满业在筹措资金方面都要依靠日本金融资本。

这就涉及到日本军部在东北的统治和日本垄断资本的支配之间的关系。如满业的成立所显示的那样，军部需要借助垄断资本的资金和技术力量建立殖民地军事工业体系以强化战争力量，同时将垄断资本纳入它的国民经济军事化轨道。日本垄断资本则需要借助军部对殖民地的统治权力，扩大其投资领域和市场范围，以剥削廉价劳动力取得廉价原料，获取有保证的高额利润，加强其垄断地位，在

竞争中发展自己。其结果是军部将自己的经济统制即垄断经济的权力，部分的奉献给垄断资本，为垄断资本保驾护航，而垄断资本则将自己的命运拴在军部的战车上，一心一意支持侵略战争。

以东北为根据地的大仓财阀和日本二流财阀浅野、日窒等以及日本个别部门的垄断企业也在相应部门拥有相当势力，获得相应的利益。至于在东北的日本中小企业，虽然数量不少，但其资本不过占日本资本总额的十分之一，且多依附于大企业，只起辅助作用。

可见，日本资本是以垄断资本为主体，国家资本的代表是满铁，产业资本的代表是满业，它们与伪满国家资本相结合，站在推行日本国策的前列。而在它们的背后，供给资本捞取利润的则是以四大财阀为中心的日本金融资本。所有这些都被挂在军部的战车上，直接间接的为侵略战争服务。

除日本资本外，起很大作用的是伪满国家资本，它首先来源于对奉系官僚资本的没收，又加上后来伪满政权以各种手段搜刮到手的财产，这部分资本增长迅速。

伪满国家资本在名义上是伪满洲国的国有资产，但是，它并不归傀儡皇帝及汉奸大臣们掌握。因为他们只不过是被摆在前台的傀儡。真正的主人公是在后台操纵的关东军及其领导下的伪满洲国总务厅、实业部、产业部及财政部的日本人高官以及各特殊公司的日本人首脑。

从总体上说，伪满国家资本是受关东军和日本金融资本的联合支配。各特殊公司之中，也有由满铁、日产、三井、三菱和大仓等分别支配的。不论哪种情况，伪满国家资本都只能看作是日本垄断资本的附庸。正如伪满傀儡政权实质上是披着独立国家外衣的日本殖民统治工具一样，伪满国家资本实质上也是披着独立国家资本外衣的日本垄断资本（国家的和私人的）的附庸。

至于东北原有的官僚资本，它的主体已被消灭，只有少数充当汉奸的原奉系官僚像于冲汉、张景惠、丁鉴修之流的个人资本保留下来，加上一些地方汉奸的资本，数量很小，既无自己的金融机关也失去垄断地位，已经构不成独立的经济力量，只不过从日本资本的垄断下分取一点残羹剩饭而已。在日伪的统计中，这部分资本与民族资本被混在一起笼统称之为土著资本。因此，我们不能将日伪资料中的土著资本简单地等同于民族资本。

摧残、限制和利用民族资本，是日伪的一贯政策。首先，日伪摧残了民族资本的金融机构，接着利用经济统制，控制了粮栈，打击了油坊、面粉厂、烧锅等土著工业，随后，将民族资本的工厂变为加工厂，商店变为配给店，最后，用储蓄、债券、税收，将民族资本逼上绝路。唯有较大民族资本中具有买办性的那部分才有所发展，而进入太平洋战争时期，民族资本全都被纳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体系，不能不依附于日本资本和特殊公司，从而带上了官僚买办性。这是在沦为日本殖民地的东北，民族资本不可避免的命运，不能因此就将民族资本混同于官僚买办资本。

通观日伪统治时期，民族资本无论就其占有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来说，都不是东北经济性质的决定因素。当然也不应忽略由于民族资本同人民生活息息相关和它同农村经济的天然联系，使它得以各种手段，包括利用黑市交易，顽强地抵抗日伪的压迫并始终佔有一席之地以及它其在抵制经济统制中所起的作用。

综上所述，可见，当时东北的社会经济形态乃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初步发展的条件下，在日本垄断资本主导下的一种殖民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这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它不是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由于自身矛盾的发展所产生的，而是在资本主义还不发达的东北沦陷区，由日本垄断资本同日本的殖民统治机构紧密结合而产生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作为完善的表述或定义，应当包括这种经济的各个基本特征，至少有以下各点：(一)日本垄断资本的全面支配；(二)资本与日伪殖民统治权力机关的紧密结合；(三)在资金与技术各方面对日本经济的全面依附；(四)严格的经济统制和特殊公司制度；(五)以重工业为核心的国民经济军事化；(六)超经济强制的广泛应用及农业中半封建地主经济仍占统治地位。。其中最重要的是前两点。因此，关于日伪统治下的东北经济性质的完整表述应该是：日本垄断资本与殖民统治权力紧密结合的殖民地军事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它是日本垄断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它又有着相对的独立性，它构成了日伪法西斯殖民统治的经济基础。正是在这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统治下，中国的民族资本遭到了毁灭性的摧残，封建地主经济发生了扭曲和变形，劳动人民受到了残暴的奴役和压迫，整个经济走上畸形发展的道路。

显然，日本在东北采取这种制度和当时资本主义世界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以及国家社会主义思潮的流行有关，不过根本上还是由于日本这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先天性的资本不足而又具有浓厚的军事封建性，有着一贯地依靠政权强制干预经济的传统。占领东北又是由日本军部所主导，以推行大陆政策为己任，将东北作为进一步扩大侵略的基地，再加上以满铁为代表的日本国家垄断资本和由原奉系官僚资本转化的伪满国家资本，掌握了东北的经济命脉，使这种经济统制成为可能。

这种经济类型在日本占领的殖民地中也是绝无仅有的。由于在东北采用独立国家的形式，拥有独自的币制、度量衡制和关税制度以及满铁、满业和伪满国家资本的存在，这就使它区别于日本政府直接统治下的朝鲜和台湾。日本在东北进行经济统制的这种模式，虽然后来也被推广到华北和华中，由于客观条件不同，统制的程度和效果也就大不相同了。

至于经济掠夺。日本侵略者美其名为“开发”。其实，对于日本侵略者来说，开发只是掠夺的一种手段。一般来说，资本主义的开发是在利润的驱使下的一种有助于社会进步的经济行为。开发总是有其建设的一面，也可以说建设本来是开发的共性。但在帝国主义占领下的殖民地有着各种性质的开发，从根本上说可分为两大类。一种是正常的开发，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有利于扩大再生产，对人民有利。另一种是掠夺式开发，是出于掠夺的需要，只对侵略者有利，破坏扩大再生产，对人民有害。

日本在东北搞的开发，恰恰是掠夺式的开发。经济掠夺是日本在东北的一切经济活动的主要动机和动力。掠夺日本急需的原料、半成品，掠夺资源、掠夺财富和掠夺劳动力。其目的基本上是两个，一是满足日本经济发展上的需要；二是服从于军事侵略的要求。

如果说，日本在东北的经济活动的终极目的在于掠夺，也要看到这种掠夺首先服从于发展日本军事工业的需要。服从于发展日本的战争力量。东北的国民经济军事化归根结底是日本的国民经济军事化的组成部分。军事优先，发展军事重

工业、化学工业，以建设对外侵略（对苏、对华）的基地，这就是日本在东北进行开发的主要动力。这种军需工业的发展，不利于扩大再生产，不能带来人民生活的改善，而是恰恰相反。它使国民经济畸形发展，它是以牺牲农业来发展工业，以牺牲轻工业来发展重工业，以牺牲民用工业来发展军用工业。军用工业越发展，人民的生活就越困苦。它要将各种财富和资源掠夺殆尽，直至榨干人民的最后一文钱、一滴血，建立起它的军需工业，以保证其军火的就地自给。

因此，日本垄断资本以“产业开发”为名修建了一些工厂，开办了一些矿山，铺设了一些铁路，盖起了一些建筑，乃是为了达到其目的的手段，既不是为了发展东北经济，更不是为了造福东北人民。正如浅田乔二先生所明确地指出的：“‘满洲事变’以后日本对东北的侵入是以掠夺东北的农业资源、工矿业资源、在东北建设独自的重工业化学工业、军事工业、以东北为对苏军事基地、以东北为侵入中国本土的前进基地等，为其主要目的。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东北的‘殖民地工业化’乃是必要的，同时，东北经济的资本主义化是不可缺的。这是由于，如果没有这‘工业化’乃至资本主义化，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的农、工矿业资源的掠夺、东北工业的重工业化学工业、军事工业化，以及针对苏联、中国本土的军事基地化都是不可能的。即东北经济的‘工业化’乃至资本主义化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了从东北强制的获得殖民地超额利润的必要性出发而实行的，绝不是为了对东北经济实行资本主义的开发而实行的。这些乃是战后日本的殖民地时期东北史研究所明确证实了的最大成果之一。”

由于东北资源的丰富和特殊的地理位置，为了建立军事工业和掠夺原料，日本在东北搞起了重工业和化学工业，发展了采矿业和电力工业，是不足为奇的。不过，这确使东北区别于日本的其他殖民地，而具有自己的特点。

应当指出的是，日本的统治，丝毫没有触动阻碍东北经济发展的封建土地制度。在农村日伪依靠封建地主阶级，维护封建势力。他们关心的只是掠夺东北的土地，大量移植日本移民，建立以日本人为核心的农村，推行农村的殖民地化。他们还以竭泽而渔的方式掠夺农民手中的粮食，使农业生产逐年萎缩，将东北人民置于常年饥馑的境地。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农民依靠土地和辛勤劳动养活自己和家人，而日本侵略者在广大地区以“治安肃正”为名，大搞“集村部落”和无人区，烧毁农民的房屋，迫使农民放弃自己的土地。又为了移植日本移民，圈占和压价强行收买近三分之一的耕地，迫使农民充当日本移民的雇工和佃户，或离乡背井去开垦荒地，或送到矿山和军事工程充当苦工。摊派劳工（“劳工供出”）和征购粮食（“粮谷出荷”）更是农民头上的两把刀，将农民置于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境地，使整个农村满目荒凉，哀鸿遍野。

城市和厂矿的工人，也是一样。由于物价飞涨，物资奇缺，生活用品的配给有名无实，生活一年不如一年。衣不蔽体，食不饱腹。特别是占工人大多数的劳工，在日伪军警、日本资本、日伪劳工组织和封建把头的多重压迫和摧残下，在日益恶劣的劳动条件下，死伤累累，朝不保夕。日本侵略者还广泛地恢复和利用封建把头制度，并动用各种超经济强制手段，压迫和剥削工人。到了 40 年代，实行“国民皆劳”整个东北成为一大劳动集中营。日伪在此建立起惨无人道的现代奴隶劳动制度。

人们生活在极端的贫困和恐怖中。经济统制无孔不入，稍有违犯就是经济犯罪。经济犯、思想犯、国事犯，帽子漫天飞。人们随时都有被抓去拷打和坐牢的危险。这是不折不扣的人间地狱。人们已经面临绝境。日伪的“王道乐土”完全断绝了人们的生路。

在东北沦陷的14年期间，由于关内正处于内战和长达8年的抗日战争的战乱之中，经济发展缓慢，经济设施遭到严重破坏，而东北在日本侵略者统治下实现了初步的工业化。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时，东北的铁路长度占全国的一半，东北的钢铁、煤炭、电力、化学工业在全国都处于领先地位。

日本战败投降后，右翼极端分子念念不忘他们的“开发”功绩，大肆散布是他们即日本侵略者将中国东北从一个荒漠开发成为文明的地区。甚至声称这些为新中国的建设打下了现代化的基础。

我们必须揭穿日本侵略者“开发”的神话，还其侵略、掠夺的本来面目，肃清其流毒，以免贻害后人。

不错，出于军事需要，日本在东北发展了重工业和化学工业。为掠夺侵略战争所需的粮食，日本又在东北突击兴建一些水利事业。这些都被吹嘘为日本占领者的功绩。其实，日伪的先进设备是靠广大农民生产的大豆换来的，荒地和农田水利工程是农民和劳工们的血汗开垦和建造的。钢铁和煤炭是矿工和工人们用血肉之躯换取的。劳工们以他们的宝贵生命造就了丰满水坝等巨大工程。然而，他们却受到了侵略者的残酷压榨和摧残。日本侵略者给予他们的是土地的剥夺，非人的折磨，野蛮的奴役，是压榨、饥饿和死伤，是经济犯、抓劳工、粮谷出荷和辅导院、万人坑。如果不是抗日战争及时取得胜利。东北人民都将陷入万劫不复的地步，请问，日本侵略者，何功之有？！

關於滿鐵與拉蒙特借款交涉

苏崇民

在满铁的历史上有一件流产的借款交涉，就是 1927 年前后满铁对美国摩根财团的借款交涉。

满铁要在中国东北修筑南满铁路的培养线，策划满蒙铁路网计划。不过它本身资金不足，在日本也很难筹措。为此，满铁早就盯上美国的游资，在美国设有纽约事务所，准备条件成熟时在美国举债。

1927 到 1928 年，在中国先有国共合作、北伐战争、奉军南下，继而有四一二政变、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宁汉合作、南昌起义，第二次北伐，形势发展对由东北进入北京把持中央政权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大元帅很不利。

在日本则有田中内阁上台，出兵山东、召开东方会议，推行侵略“满蒙”的积极政策，并任命山本条太郎为满铁总裁，积极推行其满蒙铁路网计划。

日本政府通过其驻沈阳总领事吉田茂和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对张作霖提出强硬外交交涉，逼迫张作霖解决满蒙悬案。

张作霖被北伐的国民革命军压迫的节节败退，再加上日本政府的高压紧逼，内外夹攻，面临不得不撤回东北老巢的困境。乘此之机，满铁总裁山本条太郎向张作霖提出了满蒙新五路交涉，经过威逼利诱，取得了张作霖关于新五路路权（吉会路、长大路、吉五路、洮索路和延海路）的承诺。

与此同时，满铁与日本大藏省认为条件成熟向美国摩根财团提出借款交涉，摩根的代表是拉蒙特，所以这次借款交涉被称为拉蒙特借款。

这一交涉本来是秘密进行的，满铁对美国摩根财团寄以莫大期望。这是一笔庞大的借款，经过美国有关方面的默许，讨价还价虽然很艰涩，交涉却进展的还算顺利。不过，就在借款眼看就要成功的时候，却走漏了风声。泄露之后，在中国引起轩然大波，各方抗议接踵而来，不仅有南方国民政府的抗议，而且有北方张作霖的强烈抗议。引起美国舆论对日本的不满。在中国各方的一致抗议下，美国政府权衡利害得失，终于出面干涉，使这次借款功败垂成。

借款失败的后果之一，就是张作霖回东北时所乘列车被炸，张伤重身死。应当说日本炸死张作霖并不是日本政府的意志，更不是刚刚同张作霖签订满蒙新五

路合同的满铁总裁山本条太郎所愿意看到的。因为在日本政府和山本条太郎等人心目中，张作霖仍然还有利用价值。而当时的日本军部特别是关东军的一些军官则没有这份耐心。他们对张作霖在郭松龄事件后的表现非常不满，再加上张作霖公然反对满铁向美国借款。他们想换掉这个不听话的张作霖，推出更听话的代理人，搞满蒙分离。于是就发生了炸车的一幕。

只是由于张学良等处理得当，日本的企图未能实现，而这个在日本被称为“满洲某重大事件”的皇姑屯事件，却导致张学良易帜，田中内阁不得不引咎辞职，山本条太郎的满铁总裁也被人取代。

总之，这次借款交涉涉及到中国、日本以及美国的政界、财界以及军界。借款交涉之时，可以说是日俄战争后日本和美国财界最亲密的时期。如果这一借款成功，后来的发展很可能就是另一幅样子。日本的军力再借助美国的财力，联合起来侵略东北。日美、中日、中美关系，都将不同于后来的发展变化。

所以，将这一借款交涉的来龙去脉及其背景和影响彻底揭开，对于了解 1927 年前后的历史、中日美的国际关系以及满铁的历史地位会有很大助益。满铁原始档案资料中有关此事的文件数量极多，不过其中相当部分是英文。切盼有既懂英文又对这一课题产生兴趣的人士予以关注。

日本對戰時中國的認識

——滿鐵的若干對華調查及其觀點

解学诗

满铁作为日本设在中国最大的殖民国策会社，自始即设有调查部，满铁还自称其调查部是日本乃至全亚洲独一无二的。满铁调查部及其分支机构，几十年间持续对中国、亚洲和全世界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但在中国，关于满铁调查部的研究尚属空白。日本的有关出版物绝大多数是回忆性和资料性的，系统的学术性论著也极少，至今只有原觉天《现代亚洲研究成立史论》（东京，劲草书房 1984 年版）对满铁调查部的机构和活动做过一些介绍，但很不全面。本文主要选择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满铁对中国的几次基础性调查，以观察一下日本对当时中国的认识，这对中国人自身研究与认识这段历史也许多少有些参考价值。

一、经调会的“特殊调查”和大上未广的中国社会封建性固定论

“九·一八”事变后，满铁根据关东军的要求，成立了一个特殊调查机关——经济调查会，简称经调会。经调会实际上处于关东军的直接控制之下，故有“关东军经济参谋本部”之称。其主要活动称为“立案调查”，即政策起草和调查活动。政策起草，既有伪满基本政策，即经济统制政策的起草，也包括各个部门的具体政策的拟定，而调查活动，除了围绕政策制定所进行的调查，还有另外立项的所谓“特殊调查”。综观经调会存在的近 5 年间（1932 年 1 月—1936 年 10 月），前期以政策炮制为主，后期则侧重特殊调查。特殊调查主要是以所谓“国防资源”为首的资源、兵要和一般经济调查。这些调查大都是军铁一体，由关东军与满铁共同进行。关东军这样干的目的，是把由其占领的“满蒙”尽快变成日本实行“总力战”的构成部分，即从经济、军事方面把东北推上军国主义道路，而满铁则把这些调查说成是经调会从伪满洲国基本政策和计划的制定，转向“满洲经济的根本研究”，所以经调会相对地注意一般经济，特别是农村、农业调查。

经调会的政策起草和特殊调查项目都由关东军决定，除此之外，经调会自身和调查员个人立项的调查研究也为数不少。经调会政策起草和资源调查的成果，主要以“立案调查编纂书类”和“资源调查编纂书类”内部刊出，而经调会自身和调查员个人立项的调查研究成果，主要载体是连续出版物（注：名为《经调资料》，4 年多共刊行 126 编，1/2 篇幅为 100 页以下，最长者达 900 页。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等各方面，但主要是关于一般经济，特别是农业。）和期刊。

经调会时期的期刊，影响最大者莫过于《满铁调查月报》和《满洲经济年报》。前者是满铁调查部的机关报，系综合性杂志，后者是经调会新创办的理论性期刊（注：《满铁调查月报》的前身是《满蒙事情》和《调查时报》，1931 年 9 月改为《满铁调查月报》，由满铁总务部调查课主办，1932 年 3 月由经调会接管，后由产业部、调查部接办，直到调查局时期。“月报”与“经调资料”在刊出内容上有交叉。《满洲经济年报》每年 1 期，经调会时期共出 3 期，1936 年因经调会撤销而停刊，1937 至 1939 年由产业部、调查部接办，以后改为《满洲经济研究年报》。1937 年以后的年报重点是伪满经济现时动态及关内特别是华北各地经济

趋势。), 它“向来最着力的是：满洲社会经济结构的理论分析”，其目的当然是“为了推行我国（日本）对满国策”（注：〔日〕满铁产业部：《满洲经济综观》，1937年2月印行，第1页。）。因此，“年报”由经调会中的综合调查部门——第一部编辑，而在编辑中起主导作用的则是天野元之助和大上末广。天野主要从事农业经济研究，并注重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大上则是社会经济学研究者，理论色彩浓厚。两人不仅在编辑上而且在著述上也表现了合作，但以后的“年报”编辑显然以大上为主导。大上原来作为京都帝大的学生在上海留学时由天野介绍进入满铁。他在学生时期，既狂热学习马克思主义，又忠实地从师于国家主义法西斯学者作田庄一。他在满铁调查机关不仅宣传日本马克思主义讲座派理论，而且运用马克思主义具体地分析了中国特别是东北的社会经济结构，以及农村和农业问题，因而显现出较大的能量，成为经调会和继经调会之后的产业部时期“总是提出一些具有核心意义的意见”的举足轻重的人物。但是，人们一致公认，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对他来说无非是为当时日本当权派一法西斯势力进行决策服务的一种“方法论”。

大上等人不仅是“年报”的编者，而且是主要撰稿人。如“年报”1933年版（即创刊号），卷首就是大上末广的《满洲经济之史的考察》，文章由封建主义的形成、封建主义的崩溃和资本主义的形成等三部分构成。第二篇是天野元之助的《满洲经济的结构》，主要剖析了农村和城市两个方面的经济结构。接下来是斋藤征生的《日满经济诸关系》、小泉吉雄的《满洲经济的对外诸关系》、渡边雄二的《满洲经济危机》，以及田冈三郎、北条秀一的《满洲统制经济诸问题》等。

“年报”第2、3卷的作者队伍依然如故。

诚然，“年报”所发表的论文，大部分运用了马克思主义方法，因而对于人们研究和认识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结构与性质，不无启发。惟其如此，“年报”成了1942年满铁调查部事件发生时，关东宪兵队大量逮捕满铁调查员的“罪证”之一。关东宪兵队的资料说“最先将马克思主义引进满铁调查部内的是以大上末广为中心的所谓青年将校”，并说“昭和10年版《满洲经济年报》展现了大上派的最高水平和成果”。（注：〔日〕关东宪兵队司令部警务部思想班：《满铁调查部左翼概观》，“取调参考—佐藤晴生手记摘录”（无日期记载），极秘。）可是，就在“年报”1935年版（即昭和10年版）刊出后，引起了一场影响广泛、意味深长的争论，即所谓“满洲经济”的争论。争论发端于满铁左翼调查员中西功（注：中西功，1929年入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其间加入中国共青团，1934年经尾崎秀实介绍入满铁，1936年与中共联系从事革命活动，1938年转满铁上海事务所，同年转为中共正式党员。1939年7月参加“中国抗战力调查”。1942年因中共谍报团事件被捕入狱。）对大上末广在“年报”发表的关于东北社会经济性质观点的批评与指责。大上在“年报”1935年版的《满洲农业危机的现阶段》一文中声称：“满洲社会经济构成的基础性特征是……半殖民地封建性结构”，农业危机的“发展倾向归根结底也是……受这个国家农业的殖民地的封建性结构制约的基础”。他的“半殖民地的封建性结构”的根据是：在东北农业生产中处于中心地位的大豆的生产费成本中，“佃租和捐税等各种负担”占60%左右，因而“满洲农业再生产过程所呈现的范畴是……以实物地租所体现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大上后来虽然把半殖民地的封建结构改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结构”，但对封建性结构的主张一仍其旧。

中西功曾发表过一系列有关满洲经济分析的著述。中西功认为，大上缺乏甚至“无视”对“殖民地制”以及“殖民地”与“半封建制”的相互关系的考察，

也就是“把所谓满洲国的殖民主义统治地区的殖民地的作用，从考察中抽掉了”。在中西功看来，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同殖民地化的过程同步进行的，因而极端畸形；在农业中，由于资本主义的渗透，引起了“农民的社会分化，这就是土地向寄生地主集中，而中农、贫农迅速没落和无产化，富农也几乎没有发展。这种情况，不但影响中国资产阶级，而且也决定着中国革命的性质。”（注：参阅〔日〕西村成雄《中国近代东北地域史研究》，东京，法律文化社 1984 年版，第 243—245 页。）

大上所说的“满洲经济”的封建性质是固定的，没有因为殖民地化而有所改变。他的主张，不单是学术和理论上的看法，而且是出于政策考虑。他曾称，像中西功那样只停留在“同时存在”的分析，“在真正的满洲国农业政策的制定上没有任何用处”，“至少我如果不是考虑满洲国农业政策的大发展，是不能从事满洲农业研究的”。（注：〔日〕大上末广：《再谈满洲农业的南北满型——回答中西功氏的批判》，《满洲评论》第 10 卷第 5、6、7 号，1936 年 2 月 1、8、15 日。转引自西村成雄《中国近代东北地域史研究》，第 250—251 页。）所以，大上没有在中西的批评面前后退，而且在此后不久的关于“中国统一化”问题的争论中，两人又成为对手。

“中国统一化”的争论，发生在西安事变之后，以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矢内原忠雄在《中央公论》1937 年 2 月号上发表的《支那问题之所在》一文为开端。文称：“西安事变的戏剧性效果所鲜明呈现出的形势是，以南京政府为中心的中国民族国家统一的促进和抗日态度的强化。”他还一再肯定南京政府，说它“占有与明治政府相当的社会地位”，它“财政基础巩固”，从而得出结论：“中国作为民族国家处于统一过程中，而南京政府是这一事业的承担者。”对此，中西功首先于 1937 年 4 月的《支那问题研究所所报》第 4 号发表与矢内原论文题目相同的文章，对矢内原论文中的中国资本主义化和国内统一的论点表示怀疑，并认为对于西安事变必须从“民众”、“政府”的抗日空谈和“军阀野心”等方面去考察，注意西安事变的政治背景和民众动向。更值得注意的是大上末广对矢内原论文的批评，他在 1937 年《满洲评论》第 12 卷第 12—15、17 号发表了题为《支那资本主义与南京政府的统一政策》的论文。他反对矢内原的理由，实际也还是他在“满洲经济”争论中的观点，认为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因素在强化，而且外国资本也需要中国社会维持半封建结构。大上还就列强同中国的关系述称：“为了在后进国（指中国——引者）的输出资本获得超额利润，输出国与输入国（指中国——引者）之间，社会结构上存在差异是必要的，生产方式上发达程度的不同也是需要的。中国农业中的半封建、封建结构，和大规模的停滞的手工业工厂的存在是必然的，从世界经济上来看是可以理解的。”大上并非认为中国完全不具备资本主义因素，但从中国社会在国际关系上所处的地位来说，没有其发展的可能性。总之，大上认为中国社会的殖民地化道路是必然的。（注：〔日〕松田昌治：《台湾·中国·日本——围绕台湾的诸问题和日本人的中国认识》，东京，京成社 1999 年版，第 129—133 页。）

“满洲经济”和“中国统一化”问题，是当时日本思想、学术、理论界的大争论，它涉及日本侵华的战略与决策，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当时满铁调查部将其称之为“中国资本主义论争”，并认为争论的见解分为三派，大上的观点属于第二派，即：“否认中国的资本主义化，把中国社会范畴规定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认为统一化政策是加强殖民地化的表现，没有任何积极意义。”（注：〔日〕满铁南京支所：《围绕“统一化政策”的诸见解》，1942 年 4 月油印本。1942 年

满铁上海事务所南京支所中岛邦藏曾进行蒋介石政权的“统一化政策调查”，调查中涉及中国的“中国社会史论战”。)而中西功则把大上的观点视为当时持有最富侵略性的帝国主义中国观的日本军部与右翼思想的“亚流”。

在“满洲经济”争论中对大上持批评态度的还有铃木小兵卫。(注：铃木小兵卫，1925年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毕业，新人会成员，1928年加入无产青年同盟，是《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讲座》执笔人之一，1935年任满铁“嘱托”，先后在总务部资料课、产业部资料室、东京支社、调查部第二调查室工作，1940年转协和会，任中央本部企画局第三科长，1941年12月在合作社事件中被捕。)他的《满洲的农业结构》(东京，白扬社1935年版)一书认为，中“满”存在着大规模的小佃农，它和大上所说的债务性隶农不同，已是带有向资本性租地农转化性质的农业者了，在许多情况下这种小佃农已从工资劳动者身上榨取了相当多的利润。总之，与南满比较，北部的大农民占农户数的10%，耕种面积却占耕地总面积的50%，其所需劳动力大约一半是工资劳动者，具有纯粹的富农性质。大上的观点与此相反，认为不管“年工”、“月工”都是“债务性隶农”，不是工资劳动者。(注：〔日〕石田精一：《北满农村雇农的性质》(1982年12月17日)，见〔日〕井村哲郎编《满铁调查部——关系者证言》，东京，亚洲经济研究所1996年版，第86页。)

争论无法得出结论，却促进了农村实态调查。1933年满铁公主岭农事试验场曾进行大泉眼村调查；1934年满铁又对永吉县南荒地进行了调查。“满洲经济”争论展开之后，从1936年3月起，满铁经调会与伪满洲国实业部临时产业调查局(简称“产调”)联手进行了大规模的农村实态调查。当时，东北抗日联军业已建立，东北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形成新的高潮。在这种形势下，满铁和伪满洲国政府推行以武力为后盾的征服者对被征服者的经济调查，其目的与其说是为了统一思想观点，不如说是政策的直接需要。就满铁而言，他们热衷于农村实态调查，固然不能排除调查员个人的志趣因素，但是归根结底是出于经调会中主流派意欲为伪满洲国进一步制定以农业为重点的基本政策的企图。当时，满铁经调会已经着手伪满洲国的所谓“永年计划”的制定，大上末广等坚持并试图通过调查印证其主张，贯彻其方案，即从“满洲经济”以农业为主导及其封建性和固定性出发，以农业为基本产业实行所谓“综合开发”，通过市场的开发和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克服农业危机，实现日本的对满政策，防止农民的“赤化”。当然，经调会所草拟的这种重农主义计划，根源还在于关东军。“九·一八”事变后，以石原莞尔为代表的军部一派认为，光靠武力无法打入中国“土著”社会，为了尽快把伪满纳入日本备战的“总力战”体制，应尽量利用既有的社会，与其达成妥协，使之与日本的政策协调前进。因此，经调会的计划方案，与军部建立“总力战”体制的主张，并非背道而驰。但是，由于军部中的激进黩武派日占上风，这种主张未被采纳。

二、冀东、江南农工调查与伊藤武雄的“三角地带论”

与东北的农村实态调查几乎同时，满铁以天津事务所调查课为主力还进行了冀东农村实态调查。冀东地区是指长城线以南，和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芦台一线以北以东地区，内含22县，人口600万，面积略大于日本九州，约8000余平方公里。根据1933年5月31日中日签订的《塘沽协定》，冀东成为中国军队必须撤出的“非武装区”，而且“治安维持，以

中国警察机关任之”，但“警察机关不可用刺激日本感情之武力团体”。（注：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940—941页。后来从关东军卵翼的伪军——李际春“救国军”抽出4000人，编成各以王铁相和赵雷为头目的两个保安总队，驻于滦县和丰润。）1935年12月，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出笼，冀东名副其实地沦为伪满洲国第二。冀东农村实态调查的为首者是伊藤武雄（注：伊藤武雄，1920年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入满铁，曾长期在北京、南京工作。1930年起历任交涉部庶务课长、总务部调查课长、经调会干事、天津事务所长、上海事务所长、总裁室参与。多次兼任军“嘱托”、顾问。），他当时是经调会驻天津“干事附”。关于调查缘起，他起初说是因为闲暇而“制定了冀东十三县农村实态调查计划”，“结果意外地”得到军方赞同。（注：〔日〕伊藤武雄：《生活在满铁》，东京，劲草书房1982年版，第204页。）由于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说法遭到质疑，后来他又改口称：“满铁最早在华北进行有组织的农村调查，是以天津军即中国驻屯军名义进行的第一次冀东调查。”（注：井村哲郎编：《满铁调查部——关系者证言》，第160页。）冀东农村实态调查是天津军采取华北农村对策的需要。就像日本占领台湾之后进行“台湾旧惯调查”，侵入东北时进行“满洲旧惯调查”一样，正在处心积虑以“自治”之名吞蚀全华北的日本侵略者，为了控制华北人民和建立殖民统治，他们不能不对占华北人口大多数的中国农村社会进行调查了解。1936年8月15日，也就是冀东农村实态调查刚刚结束的时候，中国驻屯军司令部推出了《农村组织化大纲》，其中突出地强调：“作为对华工作的一个侧面，应将重点置于对民众的把握上”，而作为“把握民众”的具体对策是所谓农村组织化，也就是把广大农民置于“系统的组织的合作社”之中。（注：〔日〕满铁产业部：《农村组织化大纲》，1936年12月油印本，极秘。“大纲”决定，在冀东22县设立村合作社、县联合会和合作社总局，在总局中配置“相当程度的日本人”，并实行“农家全部强制加入”。当时天津军设有由军主任参谋池田纯久控制和操纵的高桥公馆，担任农村对策研究和农村谋略工作。）当然，冀东农村实态调查的目的不限于“农村组织化”，也不单是为了冀东地区本身。不过，无论是实施所谓“农村组织化”，或者为其他目的而进行农村调查，当时只有冀东有其可能性。

冀东农村实态调查实施于1936年4至5月间，共调查了16个县的25个村。方法仿照伪满洲国“产调”的“满洲农村实态调查”；而调查表和理论，据调查班长伊藤武雄称，则来自美国经济学家巴库（注：巴库（John Lossing Buck），1890年生，美国经济学家，1916年来中国，曾任南京大学农业经济系主任、美国财政部驻中国代表、中国财政部顾问等职。曾指导中国学生在山东盐山等地进行调查。）和苏联学者马歇尔（注：马歇尔（Madyyar），苏联颇具代表性的中国研究学者，1928—1931年任莫斯科国际农业经济研究所东洋部长。）。伊藤提出包括“地区特殊生产关系”在内的6项调查要点。原觉天分析认为：“这里所提出的要点，在于揭示农民社会的结构，特别是破敝等的实态，不是平面而是立体地进行捕捉。”（注：原觉天：《现代亚洲研究成立史论》，第328页。）

那么，“捕捉”的如何呢？且以调查比较详尽的遵化县卢家寨的调查为例。那里的调查是由满铁华北农业调查著名调查员水野薰和天津军高桥公馆首脑高桥精等人进行的。卢家寨是调查所希望的“普通作物农业地区”，位于遵化县东南部，再往南20华里即达丰润县境，住户202户，人口1171人，加上在外者共1232人。调查报告表明：卢家寨有自耕农73.5%，加上自耕兼佃农则达94%以上，经营规模户均15.1亩，人均2.6亩，显然低于一般所说的每人3亩才能维持生

活的最低水平。高粱、谷子、苞米三种主要农作物播种面积，占播种总面积的 68.7%，特别是高粱占 32.6%。而三者亩产只有 4-5 斗，每斗 27.40 公斤。加上其他农业收入，全村户均收入 69.89 元，如按土地经营户计算，则户均为 85.56 元。调查报告认为，卢家寨疲敝的根本性原因是：土地分配过少，人口过剩，土地生产薄弱，天灾；特别原因是：农产品价格下降，销路狭小，苛捐杂税，负担过重，政治缺陷，村民无知，去东北受到限制导致做工收入减少，开滦煤矿萧条导致做工收入减少，副业衰落，兵祸，生产减退，洋货侵入，现金支出增加，等等。其中所谓“政治缺陷，村民无知”系指何而言，并无解释。值得注意的是，调查班还调查了村民对冀东伪政权的态度，结果是：多数人不知冀东政府为何物，也有少数人说它是日本人制造的，还有的人说冀东伪政权成立前后没变化，或说村民不问政府是谁只求生活果腹。根据以上情况，调查的结论只有两句话：一是“农村过于贫穷”；二是“他们忍受这种贫穷还能生活，但是他们将来还能忍受这种贫穷吗？”报告表示对此“深感兴趣、惊异，更感到不可理解”。尽管如此，他们将“带着这种兴趣、惊异和不可理解，寻求农村对策”。（注：《遵化县卢家寨一般调查报告书》，〔日〕伊藤武雄编：《冀东地区内二十五个村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上），冀东地区农村实态调查班 1936 年 10 月印行，第 294、388-394 页。）

此次调查的成果，除 25 个村的“实态调查报告书”外，还有《冀东地区十六县县势概况报告》，它主要揭示冀东社会经济走势，即日趋衰落。衰落原因，一如卢家寨那样是多方面的，但是很显然直接原因是日本侵略，可惜大多数调查员都回避这个问题。伊藤执笔的“调查概要”也不例外。他们不可能揭示冀东发展滞后的社会经济原因，因为所有的调查都不是为了追求真理，其着眼点是政策。不过，满铁调查机关对冀东农村调查感到意犹未尽，1937 年 2 至 3 月又进行了第二次冀东农村实态调查。此次调查虽可视为第一次调查的继续，但第二次调查是另选调查地点，另起炉灶建立调查班，甚至另外选择了调查方法，调查时间也相对较长。4 个调查班分别对谷物地区的平谷县、土布副业地区的宝坻县、种棉地区的丰润县、果树地区的昌黎县的若干农村进行了调查。但因“七七”事变发生，作为调查成果只完成了平谷、丰润、昌黎三县统计“报告书”。战后，调查参加者之一沟口房雄曾称：“只以此次调查结果给华北农村作出定义是危险的。”

（注：井村哲郎编：《满铁调查部——关系者证言》，第 156 页。）

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后，特别是“八·一三”上海事变和南京沦陷后，满铁的调查活动重点南移。“七七”事变前即已就任满铁天津事务所长的伊藤武雄，事变后很快转任满铁上海事务所长。而规模迅速膨胀到 300 人的上海事务所，不但成为满铁在上海乃至华中的活动中枢，而且在日本对华调查情特机关中也处于举足轻重的实力地位。

大致从南京陷落的 1937 年 12 月起，日军在南京至杭州一线以东地区派遣了华中宣抚班。和华北宣抚班一样，华中宣抚班中满铁人员也占相当大的比重。（注：华北宣抚班共 3000 余人，其中满铁派遣者近 800 人；华中宣抚班总人数不详，满铁派遣 78 人，据称占总人数的 1/4。）宣抚班就是在日军占领地区实施军政统治的别动队，其行动伴随着火与血。伊藤武雄却称：利用满铁人员编成宣抚班是“高明的办法”（注：伊藤武雄：《生活在满铁》，第 223 页。），还说派宣抚班是他的主意，他说服了大使馆武官原田熊吉少将（注：井村哲郎编：《满铁调查部——关系者证言》，第 243 页。）。事实表明，上海周边的各县，诸如太仓、丹阳、嘉定、芜湖、嘉善、松江、镇江等地宣抚班，以及南京、杭州两特务机关人员均

为满铁人员，为首者几乎均来自满铁上海事务所。日军派宣抚班的最终目的是建立长久的政治统治，而满铁伊藤武雄鼓吹派遣宣抚班，还有从他的“三角地带论”出发夺取三角地区经济主导权的企图。所谓三角地区，即上海、南京、杭州之间的地区，亦即成为华中经济龙头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伊藤曾称：“繁荣三角地区自然吸引中国的资本与民众；而一旦繁荣，则不战而胜。”（注：井村哲郎编：《满铁调查部——关系者证言》，第 243 页。）伊藤主张的内涵还有同中国进行政治争夺的意思。众所周知，三角地区不仅是中国的经济中心，也是日伪统治中心，更是抗日武装力量，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抗日游击活动极为活跃的地区。1938 年 12 月，正值满铁华中宣抚班活动高潮，新四军已建立了以茅山（注：茅山位于江苏省句容县城东南部。）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进入 1939 年，特别是当年夏天，新四军更派兵东进，开辟了苏（州）、常（熟）、太（仓）、澄（江阳）、虞（常熟虞山）抗日根据地。（注：蔡德金：《历史的怪胎——汪精卫国民政府》，广西师大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63 页。该书载：1940 年 6 月，江南新四军北上后，新四军第三支队副司令谭震林进入江南地区，建立江南人民救国东路指挥部，统一党的领导，并与当地游击队会合，建立各县办事处和群众团体。）因此，宣抚班不仅是随军政治工作队，也是对华调查队，尤其满铁上海事务所不惜派出像河野正直这样参事级大调查员和熊谷康等重要情报员参与，并将宣抚工作报告当做正式调查资料处理。

不仅如此，满铁还在宣抚班活动地区进行了“把握社会结构基础实态”的农村实态调查，即先后于 1939 和 1940 年进行的常熟、太仓、嘉定和无锡、南通、松江等地的江南农村农态调查。从调查方法上说，它与“满洲农村实态调查”一脉相承，但更带有火药味。由新居芳郎等完成的太仓班《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包括：“太仓县势概要”、“调查部落概要”、“农耕情况”、“土地租佃关系情况”、

“农产品销售情况”、“劳动方面情况”、“农业金融”、“农村社会情况”、“治安及其他”、“选择及户别调查诸表”等。（注：〔日〕满铁调查部：《调查成果内容梗概》昭和 15 年（1940 年）度上半期，第 39 页。）而南通县的调查，“调查对象村庄头总庙距我最前线据点金沙镇仅一华里，距敌之前线也仅仅四五公里，因而治安极其恶劣。村内主持者，例如称作保长或乡长者的向导全部逃跑。”（注：〔日〕满铁调查部：《调查成果内容梗概》昭和 15 年（1940 年）度下半期，第 48-49 页。）在这种地方能够进行“社会结构基础性”调查吗？如何进行调查呢？不过，当我们了解到满铁调查员三轮武把《中国游击运动现势》也列入“农业关系调查”项目之后，疑虑可以打消。此时的满铁调查部已大致明白，中国人民抗日力量源泉主要在广大农村。

无锡县的农村实态调查是 1940 年进行的。调查前还穿插进行了紧急无锡工业调查，从这项调查中更可以看出与宣抚班活动相衔接的江南农工调查的意图和判断。调查是驻苏州的广野部队提出的，他们认为，“光靠武力维持治安的时期已经成为过去”，“向新秩序出发的可能阶段业已来临”，“对策的方向我们不是不知，只是由于重要的实情不清，难以作出具体处理”。（注：〔日〕满铁调查部：《无锡工业实态调查报告书》，1940 年 5 月，“前言”，第 4-5 页。）应军部要求，满铁上海事务所投入强大人力于 1939 年 6 月至 8 月对无锡进行了工业调查。无锡是长江三角洲最重要的民族资本工业典型城市，当时逃到上海、香港和四川等地的无锡民族资本家虽然未归，但未放弃无锡工业，而且进行着种种策划；对日本来说更严峻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已挺进到包括无锡一带的长江三角洲，被看成是“建立新秩序”的最大障碍。而当时的日本侵华战略是：在继续进

行对华军事施压的同时，竭力实施对华诱降。对于长江三角洲，则采取某种政治经济怀柔政策，进而“不战而取”全华中。无锡工业调查与江南 6 县农村实态调查一脉相承，都是意在建立所谓“新秩序”，即政治经济统治。而无锡处于中心环节，所以满铁调查宗旨是“使之成为华中新秩序建设的基础资料”（注：〔日〕调查部综合课：《调查部报》第 3 号，1939 年 8 月 11 日，第 11-12 页。）。

无锡工业调查共调查各行业的工厂达 664 家。“调查结果概要”显示：1937 年 11 月 22 日日军攻陷无锡城时，炮火摧毁了房屋 3 万数千所，机械化近代工厂生产能力丧失一半，其余小工厂生产能力降低 2 至 3 成，日本占领后采取“委任经营工厂”的形式进行恢复，但生产能力也不到战前的 1/3，超过六七万的工人大部分失业。调查的结论是：“与民族资本的妥协无论如何是必要的”，并认为“不能千篇一律地制造合办公厂”。（注：《无锡工业实态调查报告书》，第 10-13 页。）

“概要”所透露出来的对占领区包括招揽民族资本回归的政治经济政策调整意图，是贯穿于全报告书的着眼点。正是根据这一着眼点，报告书最后在言及运输流通机构的破坏时，特别指出：在无锡市场的背后地区，新四军“命令统一”，

“他们的活动相当组织化、合理化”，“把工作的目标放在‘民心的把握上’”。面对这种局面，调查报告认为，如果只是实行“统制”，不仅市场无法恢复，“一般民众的不平不满也会更大，结果给附近的游击队活动创造更为有利的客观态势”。（注：《无锡工业实态调查报告书》，第 797-801 页。）满铁调查部称此项调查成果是“解决新中国建设和新秩序确立问题的一把钥匙”（注：《无锡工业实态调查报告书》，第 1 页。）。不错，1940 年 3 月，汪精卫伪国民政府成立时日军发表了军管工厂返还声明，但是，归还部分中国公私企业与经济设施，归根结底是企图更广泛地扩大其“指导力”。其实这也是伊藤武雄的“三角地带论”及其领导下的上海事务所进行江南农业和工业调查的真髓。

三、“中国抗战力调查”与左翼调查员中西功的战时中国观

在江南农业和工业调查进行的同时，满铁调查部以上海事务所为中心还进行了规模和影响更大的“中国抗战力调查”。此项调查，是满铁大调查部时期被置于中心地位的综合调查之一。而所谓综合调查，“就是对一定的调查课题，从‘日满华’的政治角度和经济角度等进行多方面科学分析和科学综合”（注：〔日〕野间清等：《满铁调查部综合调查报告集》，东京，亚纪书房 1982 年版，“前言”，第 4 页。）。“中国抗战力调查”不但是满铁调查部综合调查的首选，而且是满铁自认为比较成功的调查。（注：继“中国抗战力调查”而进行的“日满华通货膨胀调查”和“战时经济调查”，均未达成调查目的，无果而终。其他如“中国惯行调查”虽亦系综合调查，但系所谓“客体”调查，亦未最后完成。）说其成功，主要表现是：(1) 从分析中国社会性质出发，揭示了中国经济、政治、军事等各方面抗战力量的消长变化。(2) 得到了日本当政者，特别是军部的关注。前者源于极少数左翼调查员在调查中起了主导作用，后者是因为当时是日本侵华战争处于转折的阶段，日本的战争决策者们急欲获得有关中国的更深层次的高级战略情报。

调查的实际倡议者具岛兼三郎（注：具岛兼三郎当时是调查部综合课职员。战后曾任九州大学教授、校长。）是调查部中勇于表明观点的调查员。推进调查的中心人物中西功，是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他介入调查后，不独根据其“对日作战的战力中心是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民众力量”的观点，建议将重庆抗

战力调查改为中国抗战力调查，使调查的内容得以拓宽和升华，而且以其特有的身份（中共上海情报科战略情报员）和政治理论素养，能够得到和充分利用别人难以获得的资料，并把资料提供给每个调查员，以推进调查。中西功的知遇者尾崎秀实是因佐尔格事件而捐躯的著名革命者，被誉为“纯洁无瑕的爱国者和思想家”（注：〔日〕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会著、那庚辰译：《近代日本思想史》第3卷，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29页。）。他主要从理论和方法论方面给调查以帮助，并在调查中精辟地阐述了日本政治形势。他对中国抗战力调查成果的总评，也和调查成果一样重要。

中国抗战力调查于1939年7月实际着手工作，1940年5月汇总，形成了以《昭和14年度总括资料》为名的报告书，共为5篇10分册，作为“极秘”资料内部刊行，1970年由日本三一书房合为一册出版。

由中西功执笔的第1分册“总篇”显然是全部调查的缩影和集中概括，其主要内容是调查的方法论和总结。调查的方法论，实质是理论指导问题。这个问题，用一句话说，就是“中国社会本身的基础性调查研究与现实情势把握的统一”（注：〔日〕满铁调查部中国抗战力调查委员会：《昭和14年度总括资料》第1分册，满铁1940年内部刊印，“序”，第1页。）。因为抗战力调查委员会给自己确定的目标，是调查研究“中国抗战力的本质”，或者说是“中国抗战力的质的研究”，而这只能从中国社会结构的特质中去寻找。“总篇”指出：“现代国家在其战时体制中，作为现代国家的因果律发生作用；半殖民地国家因为有其独特的因果律，不认清这一因果律，在半殖民地国家与现代国家对抗时，就无法考虑其战争能力的性质问题。”如何具体地对中国抗战力形成进行质的考察呢？“总篇”提出两个方面：“一是这场战争对中国社会所具有的性质；二是进入战争过程的中国社会性质。”简言之，即战争的性质和战争中中国社会的性质。关于前者，“总篇”提出3个观点：（1）战争是包括民族资本家和地主阶级在内的“全国民（民族）的抗战”。（2）由于贫弱落后，从战争开始“就要求中国政治经济重组”，而“重组的方向是中国政治经济的近代化”。（3）对中国而言，战争不仅是领土问题，而且由于日军是部分地占领了中国，所以在战争进行的一定阶段，在占领区内部或占领区与非占领区之间，还存在着复杂的政治经济斗争。“总篇”的结论为，面对这一切，解决困难的关键是：民众动员和政治动员，也就是“民主化和政治统一问题”。（注：《昭和14年度总括资料》第1分册，第2-3页。）那么，中国社会是否具备这种能力呢？“总篇”从中国社会性质的角度，指出其所具备的4个主要条件：（1）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地位。（2）百年来特别是20年来中国民族取得了发展。（3）虽然落后但地大物博和农村经济的存在。（4）国外条件。（注：《昭和14年度总括资料》第1分册，第3页。）“总篇”的观点，显然受到了毛泽东1938年5月所作的《论持久战》报告的影响。“中国抗战力调查”实际上就是具体地调查分析由社会性质所决定的中国全民抗战赖以实现的条件与因素的发展变化，从而评估中国抗战能力和战争发展的阶段性变化，所以称之为方法论。

“总篇”中的“中国抗战力调查总括报告书”，不是调查的全部总结，而主要是关于国民党政权下战时经济与财政政策的分析，故容后再谈。

第2分册和第3分册是政治篇。由中西功执笔的第2分册是“战时的中国内政”。尾崎秀实评论称：“这部分是全报告书最高水平之所在。”（注：〔日〕尾崎秀实：《关于中国抗战力调查委员会“昭和14年度总括资料”》，《满铁资料汇报》第6卷第4号，1941年4月，第8页。）该报告书首先分析了战争前后中国国民党等各党派的动向，揭示了因战争而动摇了的社会根基，以及在这个根基之上的

中国社会更加深刻的复杂性。不过，重点是第 2 章“民众动员和中国政治”。报告书明确指出：“中国的民众动员存在着性质不同的两条道路：一是国民党的方向；另一是中国共产党指导的方向。”前者包括国民政府战时编成的 300 万新军，完全是强制性的和义务性的，而且土豪劣绅从中舞弊，不仅难以收到战时动员之效，而且酿成广大农民的离反。“相反，中国共产党把群众动员理解为群众自身的运动。也就是，根据群众的直接利益组织群众，与此同时以此种组织力将群众向政治（抗日）、军事（游击战）、生产等方面动员。”报告书的观点非常明确：

“中国抗战力的据点在农村；动员的基本阶级是农民。”（注：尾崎秀实：《关于中国抗战力调查委员会“昭和 14 年度总括资料”》，《满铁资料汇报》第 6 卷第 4 号，第 9 页。）而农民动员必然关系到农业改革和土地问题，进而触及农村政治民主化以及统一化等中国政治大问题。

由津金常知和小仓音次郎执笔的第 3 分册“八路军与新四军”，主要是根据中国方面的资料对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活动作了政治、军事、社会经济和地区性的说明。尾崎秀实说，这是“中共领导下的这些军队采取什么方针和有什么动向的最早说明”，“使我们注意到，中共独特的抗战方式是如何地倾注深刻的努力抓住广泛的农村社会”。（注：尾崎秀实：《关于中国抗战力调查委员会“昭和 14 年度总括资料”》，《满铁资料汇报》第 6 卷第 4 号，第 10 页。）应该特别注意的是，报告书结论性地声称：“华北形势的发展，是日中战争整个形势发展的缩影，并且先行于其他地区近半年。”的确，由于八路军的抗日游击战争扩展到全华北，使日军不得不将其主力转移到华北，因而早于全国进入对日的战略相持阶段。而且，正如报告书所说，“华北游击区的发展，已经由对日作战的意义，正在逐渐转向对内革命的意义”（注：《昭和 14 年度总括资料》第 3 分册，第 160—163 页。）。对于活动在长江下游一带坚持抗日武装斗争的新四军，报告书指出了它在牵制日军进攻、扰乱日军后方、配合正规军作战、破坏伪政权、牵制国民党中央妥协、牵制日军向西北进攻破坏共产党根据地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但是，尾崎秀实认为，报告书对于新四军与国民党的对立，看法有些肤浅。尾崎说：“这个地区，是江浙财阀及与之勾结的英美资本的经济基地和国民党的地盘。这个对立触及了抗日政权下政治问题的本质。”（注：尾崎秀实：《关于中国抗战力调查委员会“昭和 14 年度总括资料”》，《满铁资料汇报》第 6 卷第 4 号，第 10—11 页。）

由 10 个分册构成的中国抗战力调查报告书中经济问题占最大篇幅：第 4 至第 7 分册是“经济政策篇”；第 8、9 分册为“内地经济篇”。相应地，由中西功执笔的编在第 1 分册“总篇”中的“中国抗战力调查总括报告书”，内容全部是关于中国，主要是国民党管辖区的经济政策与经济状况的论述。所以，他的总括报告书也可以说是经济政策篇和内地经济篇的集中概括。作为最后的结论，他把政治力与经济力联系起来，并从战争以来的发展中，考察了这两种力相结合的消长变化。

为了持续抗战，中国必须强化军事、统一政治和重组经济。由于包括工业大城市在内的国土沦丧和西南被封锁等，内地经济确实非常困难。但是，中西功认为“重庆政权无论如何还没有达到毫无办法的地步。战时经济力的最大限度是国民无法生活”，“现在重庆政府的粮食问题，与其说是米的绝对缺乏，不如说是其政策极其恶劣”。他还说：“中国被称为地大物博，也就是说，任何方面都表现为五千年的传统农业经济。如果拥有把它们适当组织起来的智慧、意志和手段，即使是极原始的方法，在量的方面也是相当大的力度。其中决定性的是意志，是方法手段。这些在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体现为政策，而实行、实现的力量总

称为政治力。”“随着战争逐阶段地深刻化，该国政治结构必然大幅度地重组，而重组是战争深刻化的前提条件。”“然而，这种重组的内容，不是简单的既有统治阶层的统一或重组，而是以阶级性的组合为内容。也就是，其本身是深刻的阶级斗争，所以，这是中国抗战力的最大问题。”从这个观点出发，中西功指出：“中国政治上动摇的决定性因素是国共决裂。某种场合还有中国民族资本和地主的内部分裂。后者现在已由南京和重庆的对立中表现出来。”（注：《昭和 14 年度总括资料》第 1 分册，第 123 页。）而引起中国政治动摇的原因，除国际形势、中国内部政治力量对比外，还有日本对华政策。而这些都是变动的不确定因素。中西功把 1939 年分成三阶段进行分析后得出结论称：“总之，国共分离还不是今天、明天的问题，但并非没有分裂的可能性。不过，现在还是存在继续合作的可能性。今年 11 月为中心的宪法斗争，说不定会看清这一长期合作和将来的中华共和国的前景。”（注：〔日〕中西功：《关于日中事变的阶段性划分》（抗战力调查委员会参考资料），1940 年 2 月 23 日油印本。资料将 1939 年分为 3 个时期：（1）武汉陷落到 4 月反攻（一应整理期）。（2）5 月到欧洲大战前后《最大混乱期》。（3）欧洲大战至 1940 年初（再次整理和新时期开始）。）通过对 1940 年的三阶段分析，中西功又得出结论说：“随着世界战争的进展，中国事变再次显现出持久的局面，真正的政治优越于军事的局面展开了。这种情况在政治上的反映，就是承认新中央政府吧！”（注：《昭和 14 年度总括资料》第 1 分册，第 138 页。关于当时的军事情况，文内称：日本认为需要最大限度地利用西南封锁和对重庆的军事压力迅速处理事变，但是重庆方面对日本的第四次军事全面攻势警戒很强，8 月八路军的华北出击（百团大战）也与此相关联，而且在欧洲战场，法、荷等国败北，又有三国同盟成立，故做出如上判断。）

对于具岛兼三郎执笔的第 10 分册“外援篇”，尾崎秀实认为，也是编写最好的报告书之一，尤其第 2 章“各国为何进行对华援助”，第 3 章“各国对华援助的各种条件”，第 5 章“援助的实绩”，都很周详。尾崎指出：“报告中具体地阐释，英美等各列强援蒋态度的本质归根到底在于维持殖民地统治。”（注：尾崎秀实：《关于中国抗战力调查委员会“昭和 14 年度总括资料”》，《满铁资料汇报》第 6 卷第 4 号，第 3 页。）

上述调查成果，是在 1940 年 3 月下旬的第 2 次中间报告会之后形成的。5 月末又进行了第 3 次中间报告会，其间中西功作了“总括报告”。然后，从 6 月 1 日到 7 月末止，向各地的诸多方面广泛地作了报告。原满铁调查员野野村一雄称：“在满铁的综合调查中，将汇总的成果用活版印刷刊行的形式得以作为文书保留下，同时，从东京、奉天、新京到上海、南京、北京多次举行报告会，大规模口头报告其内容，这恐怕是独一无二的。”（注：〔日〕石堂清伦、野间清、野野村一雄、小林庄一：《十五年战争与满铁调查部》，东京，原书房 1986 年版，第 60 页。）当时，从日本中央到现地军政枢要部门几乎无不聆听满铁调查员的报告，诸如满铁总裁大村卓一、关东军参谋长饭村中将、上海武官府岩村武官长、中国派遣舰队岛田司令官、阿部大使、中国派遣军板垣总参谋长、华北派遣军司令官多田骏等都亲自出席。满铁调查员还应邀与参谋本部、陆军省的人员座谈讨论。

历史上的侵略者无不投机性地妄图靠突袭侥幸取胜。日本侵略与征服中国的战术也是建立在妄图给中国以一击就可以迫使中国认输求和的“速战论”的基础之上的。他们没有也不愿意正视中华民族所蕴藏的抗战实力。直到武汉战役，他们还认为武汉已是“最后的战场”，可中国仍未投降。“速战论”的破产，使日本

侵略者不得不接受战争长期化的现实。但是，他们还是妄图用军事压力和政治谋略相结合的办法，达到尽快征服中国的目的。1940年1月1日，中国派遣军总军提出的《关于解决事变的极秘指导》，要求“以至昭和15年（1940年）秋季左右为目标，特别努力解决事变。在强化促进汪工作的同时进行对重庆工作。适时捕捉对重庆停战时机，并指导汪、重庆的合流。”（注：〔日〕臼井胜美、稻叶正夫编集：《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2），东京，みすず书房1964年版，第583页。）如前所述，满铁调查员在各地进行关于中国抗战力调查的报告会的时候，正值日本军部推行其方针，一方面由中国派遣军情报部长今井武夫进行对重庆的“桐工作”（1940年5月至9月在香港与蒋介石代表宋子良秘密谈判）；一方面配合政治谋略，进行“宜昌作战”等军事施压的战争行为，以期重庆方面尽早投降。所以，中国抗战力调查之所以受到各方面的关注，固然是报告的内容所使然，更重要的是，它是当时日本对华政策所需要的战略情报调查。日本有的人士认为，中国抗战力调查的结论是：日本不能战胜中国，中国却能在战争中实现革命性变革。这种看法也不错。因为，中西功等主导调查员的政治观点和贯穿在报告中的论证都是如此。但是，第一，站在帝国主义立场的人们不可能同意此种观点；第二，在天皇制专制主义下推行军国主义侵略路线，其营垒内部无以产生足以使形势逆转的力量。因此，中国抗战力调查报告并不具备遏制战争的回天之力。日本军政当局之饶有兴趣地听取报告，就是因为它是情报，而且是战略情报。所以，“中国抗战力调查”也只是“火”了一年，之后它在满铁综合调查中的“中心”地位即被其他调查项目所取代。及至中西功等被捕、满铁调查部事件发生后，抗战力调查委员会便被取消了。

四、结语

综观满铁调查部的几十年历史，大大小小的对华调查活动，不计其数。就大型调查项目而言，继“中国抗战力调查”之后，还有为期10年、投入力量更大的“中国惯行调查”。这项调查系满铁调查部与日本东亚研究所合作进行，包括“中国农村惯行调查”、“华中商工惯行调查”和“城市不动产惯行调查”。但是，满铁几乎所有的对华调查，其政策目的都是明确的，或者说都是先有政策，后有调查，并非是将政策的制定和形成放在客观的、科学的调查基础之上。这就决定了满铁大量对华调查所形成的对中国的认识，不可避免地带有局限性，以至错误。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应该充分地分析研究满铁调查及其成果观点，对于极少数左翼调查员的调查与观点更应详加探讨，他们可能受到中国观点的影响，但绝非是中国观点的简单重复。为了从本质上认识战时的中国，辨别战时中国历史的是非，需要拓宽视野和思路，而影响广泛的满铁对华调查及其成果观点是不能忽视的。

文章出处：《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4期

大連圖書館藏“滿鐵”文獻之研究價值

冷绣锦*

日俄战争之后，日本为统治中国东北，在大连策划建立“满铁公司”，其寻求的是战场上所未达到的目的。1907年3月5日，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由东京迁移到大连，随之东北就成为以“满铁”为中心的“大陆经营”，实行经营东北的“唯一秘诀就是表面上装着经营铁路，暗地里则要充实各种设施。根据这一种秘诀，租借地内的统治机构和经营铁路的机构要截然分开。（日本参谋总长儿玉源太郎在其所拟定的《经营满洲策略概要》）所以，日本统治当局在铺设铁路的同时，也在政治、经济、文化、港口贸易等方面进行垄断。

满铁大连图书馆担负着满铁在东北经营的社会文化宣传和经营文化策略的主导机构。其建立的目的为“参考图书馆和满洲文化的二大业务源”，沿线各图书馆以搜集各地域风情、资源文献等方式开设。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以后，满铁图书馆实行了“全面的革新，改变其经营方针，才能达到其目的”，最终以“满铁”大连图书馆和奉天图书馆为中心，成为社业与调查研究参考图书馆，逐步形成满洲开发研究的重要文献集积场所和满洲情报调查研究中心。

一 满铁大连图书馆藏书体系的建立

（一）搜集东洋文化与满铁图书馆的使命

满铁大连图书馆搜集文献的目的可划为二个主线。一为“满铁”大连图书馆的业务参考图书；一为搜集“远东”文献（东洋文化）。前者从“会社的立场角度出发，性质上是会社参考图书馆为主，公开意义上的图书馆为副”。故其业务目标：“一是广泛搜集国内外古今中外的图书兼会社业务参考及提供公众阅览；二是会社所属的图书管理。”而后者图书大多是珍本以及罕见的图书。

首先在搜集过程中，“不遗余力地，甚至不惜巨额的经费。在广泛、深度的基础上，进行有效地收藏，这个方针我想以后还会继续的。”“有关西域为中心的东洋方面的西文图书，以及看到的豪华贵重文献，完全超出社业图书馆的藏书。而且可以感觉到满铁文化使命（当时所想）的巨大财富”是贯穿满铁大连图书馆的主要业务方向。所以图书搜集内容广泛，如交通、产业、经济、政治、法律、工学方面的参考书，以及中国和俄国关系、西方学者研究中国、东亚方面的图书，以及价格比较高的参考图书、政府学会等刊物，或在业务上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的调查数据。

其次，领域内采购文献、针对性收购文献，也称特殊搜集，另为寄赠文献的藏书体系。

第一，领域内采购文献按1936年7月各馆开始实施的《各馆搜书分担协议》，满铁大连图书馆在分担领域内（交通、政治、法律、经济、财政、社会、统计、殖民、产业以及有关与中国相关的图书）进行采购。

第二，针对性采购，满铁称之为“特殊搜集”。有关满铁大连图书馆搜集这方面的图书是聘请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文学博士羽田亨为特约人，搜集有关西方学者研究中国方面的论著。聘请汉学家松崎鹤雄、黑田原次郎、岛田好等收集有关

* 冷绣锦，女，辽宁大连人，大连图书馆古籍部副主任兼历史文献研究所副所长，研究馆员。

中国古籍。满铁利用这些专家到欧洲和中国各地广泛收集珍贵、有价值的文献，甚至利用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派往中国各地的人员，以及满铁调查部驻各地事务所的人员来为满铁大连图书馆搜集文献。有些日本学者借助满铁大连图书馆，来实现自己获得东洋文化的梦想。如购买劳斯的全部藏书就是典型的例子，“……由于离北京近的原因，最初北京学者们利用满铁掠夺文物是很困难，……由于大学没有购书经费，所以贵重图书就由连图购买。综合实际情况，我们地处大陆和日本的连接地，连图就成为东洋文化殿堂的梦想。专心致力于充实连图的文献，不管是精通东洋方面西文图书的柿沼介馆长、还是对汉籍造诣博学研究的松崎鹤雄的先生，心中都蕴藏着实现宏伟蓝图的伟大规划。”

第三，是以寄赠方式搜集图书。有些在书店和书市上很难能买得到的图书以及非卖品的图书，主要依靠鼓励寄赠图书。如 1925 年 11 月大谷光瑞赠送给大连图书馆的西域探险的部分藏书，其中包括汉籍图书 5000 余册，西文图书 300 余册。

如上所述满铁大连图书馆成为日本殖民者掠夺东方文化的基地。随着他们的“宏伟蓝图的伟大规划”的膨胀，满铁大连图书馆的藏书体系也在逐步扩大，从中国古刊典籍到西方文化，从中国地方县州志到殿版珍藏等，一步步通过各个管道获取中国的文化精髓来注满大连图书馆的藏书，满铁大连图书馆就逐步成为他们所谓的“东洋文化殿堂的梦想”。

（二）逐渐形成三大藏书体系

1. 广泛收集古刊汉籍类文献

满铁大连图书馆分别在 1922 年 1 月、1923 年 2 月、1927 年 9 月、1929 年 9 月多次派人员到北京购买重要的汉籍图书，据《满铁附属地沿革全史》记载 1929 年 1 月一次就购买约 10 万余元贵重汉籍文献。这其中世特别注目的古刊，如宋刊《淮南子》等 7 部、元刊 10 多部、清刊雍正年间铜活字版《古今图书集成》（大开本）、初版本《介子园画传》等，也包括“海源阁旧藏宋版书 8 种、元版书 10 多种和 4000 余种中国文献古籍”。这些图书极其珍贵，当时中国政府不准其外流。满铁不惜借用日本军队的力量。有关这部分汉籍的来历在《大谷武男的回忆》手稿中有所提及：“由于购入这部分古籍数额巨大，又多珍本，遭到北京政府的反对，于是满铁便委托天津日本驻屯军，向其借用驱逐舰秘密把书运到大连码头。”

满铁大连图书馆的汉籍搜集，除了大多依靠松崎鹤雄等人之外，还依托满铁出差的人士购入。如大谷武男在谈到南寿嘉业堂藏书楼 50 余册的《永乐大典》的购买途径：“在那以后又数次购入大量汉籍、档案（官厅保管的文献楼）等文献，但特别值得一提是，能得到南寿嘉业堂藏书楼五十余册的永乐大典（这是世界珍稀之书，再加上连图的旧藏书数，在藏书数量上仅此于北京图书馆，与美国议会图书馆、日本东洋文库相比也遥遥领先），这是我们大连图书馆的自豪，也将是（大连图书馆）未来的一丝希望。”另外，在 1944 年购入大宗汉籍达 123 部（汉籍 85 部、满文 34 部，其它 4 部），825 册、29 张图和家谱之类，共计 18183797 元。有关这部分购书经过在大连图书馆文书中均有记载。

上述几个事例是满铁大连图书馆在针对性购买古籍时的几个典型而已。这就说明日本企图把满铁大连图书馆最初收藏古籍的梦想是作为中国文化的“冀望天堂”。

2. 有关中国通志、府县志类文献收集

满铁时期共收藏的中国古籍文献中有“地方志文献”2491种，以及有关舆图珍品收藏。包括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1662个县的方志。其中有109种善本，堪称方志的精品，最早版本为明正德二年刻的《姑苏志》，另有8种是海内孤本。这部分图书是大连图书馆建立之前，该馆还属于满铁调查课图书室时代，曾依靠会社成员到中国各地出差时购买的文献，其中有许多绝版的文献，约690余部。满铁大连图书馆馆长神田城太郎所说：“参考图书馆的任务就是搜集支那州县志的图书，这是调查课图书室时期调查课作为调查资料而允许购入的一些汉籍。其中部分偏重于调查资料上的需要，购买了十几部州县志的文献……竭尽全力搜集……如此规模的搜集恐怕可以说只有满铁图书馆才能这样做。这不是溢美之辞。”

3. 有关西文出版的中国文献收集

满铁大连图书馆特别聘请东京帝国大学文学博士羽田亨进行调查搜集。主要是针对欧美学者出版的文献藏书。1922年6月购入哈尔滨的俄国黑龙江军管图书馆的所有藏书，被称为“オゾ文库”（音译“欧洲”），加上其后购入该馆所藏的俄国文献约3万册，以及满洲、蒙古、西伯利亚地方有关俄国方面的研究资料，也包括经济、产业、军事、历史、地理、文学等图书。此外在满洲、蒙古地方的俄国探险队的调查报告书，战后绝版的初期俄国文学也不少。1925年羽田亨去欧洲之际所购买的《通报》以及其它有关中国学研究资料等贵重定期刊物《バツク ナンバー》（过期出版物）；1925年购入原驻长春俄国领事ラブロフ（拉布劳夫）所搜集的有关中国边境欧文图书约500册，以及“1937年所刊行的《Classified Catalogue of Books in European Languages in Dairen Library of the South Manchuria Railway Company, Far East》6000册”（《在满铁大连图书馆收藏的欧洲文献目录》）。1939年时期，该馆还藏有远东方面的图书共16000多册，同时该馆还计划网罗著名的西文中国学者所出版有关方面的图书和一些贵重的定期刊物。

另外，有关戏曲文库。戏曲文库原有西卷透三所收藏的戏剧方面的主要是明治、大正时代的文献2000多册，杂志约3000册，还收集日本各地刊行的文艺杂志所发表的戏曲文献。中国医学的图书4000多册，这些书是受满洲医科大学中国医学研究室委托，为学者研究的参考资料。

（三）藏书语种与种类概况

满铁大连图书馆藏书语种主要以中日文为主，西文和俄文为辅，也包括杂志和寄赠图书。所有图书内容如下：1918年3月末满铁大连图书馆的藏书为49952册，1922年该馆藏书为69500余册，1927年达到121500余册，在这5年期间增加图书达52000余册。1929年4月期间藏书为131260余册，7月藏书达135990余册，在3个月期间增加4700多册，平均每月增加图书1500多册。1929年当时比例，中日文占总体的83%，西文书籍约占13%。藏书类别以史地类占最多，约占20%，其次为总类16%，政治类14%，文学语言类12%，哲学宗教7%，满蒙6%。到1937年藏书已增加212876册，其中包括：和汉书籍182,456册，西文图书（不包括俄文图书）30420册，此外一部分图书小册子为6400册。杂志652种（购入289种，寄赠363种）。也包括装订的532种，报纸57种（购入40种，寄赠17种）和39种装订的报纸。伪满洲国所刊行的报纸刊物均予保存。

满铁大连图书馆于1945年8月由苏联军管，而很多珍藏如海源阁购买的宋版文献以及部分元版书稿、舆图被盗运，包括原藏55册的《永乐大典》被苏军

拿走。1949 年 10 月原满铁大连图书馆由旅大人民政府接管，改为“旅大市图书馆”，1950 年原满铁大连图书馆的部分藏书被国家机关、文物机关、档案部门和科研机构调走。1954 年苏联列宁图书馆送还我国外交部满铁大连图书馆所藏的 52 册《永乐大典》。1951 年更名的“大连图书馆”所藏满铁书图约 40 多万册。

二 大连图书馆藏“满铁”文献之价值

(一) 中文古刊类的特色文献珍藏

大连图书馆古旧籍藏书 55 万册（1945 年以前出版的文献）。其中满铁大连图书馆所收藏 40 多万册书刊，1951 年后接收了罗振玉原藏 9 万余册和王永江原藏 3 万余册的中文线装文献，以及建国后陆续购买的古籍文献。现在大连图书馆所藏的 55 万册古旧书刊文献中，有 26 万古籍线装文献。古籍线装文献中分经、史、子、集类。其中经部类 1000 多种；史部类 3500 多种；子集藏有 2600 多种；集部 3000 种。各种版本不胜枚举，都有很高的价值。

大连图书馆藏有满铁大连图书馆的中国古籍有 20 多万册，其中不乏各种类型的版本，形式多样，如古籍线装书、舆图、内务府档案、家谱、名人书画、公牍电文等。而这些资料不管是在学术方面，还是版本方面，都有较高研究价值。满铁图书馆所收藏的明清小说方面的文献，更是被海内外学者赞誉，如《金瓶梅》《红楼梦》等刊本和抄本，其中有 120 种被列为国家级善本和数十种孤本。《西游记》有古本的 100 卷、绘本的 44 卷，为元、明、民国时期的不同版本。还有康熙刻本的《续虞初志》、明刻与清初刻本的《后水浒传》、万历刻的《混唐后传》、明刊本的《醒世阴阳梦》等，有关《水浒传》方面的小说有 10 种。另有“满文刻本《金瓶梅》题名为《世态炎凉》尤为海内外学者所看重。此书译于康熙年间，现国内只存藏七部，且多为残本，抄本更少。满文刻本《三国演义》刻于清顺治七年（1650 年），全十二册，包背装，国内仅存两部，另一部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北京图书馆存有一部残本”。以上各刻本都属于稀世版本。另外还有 1939 年购入的殿版文献《剿捕临清逆匪纪略》等。

此外，满铁大连图书馆时期还藏有清朝武英殿刻本、聚珍本、“典礼”“孤本”、明清刻本也很多。如：《皇明典礼》（属于明建文朝刻本为罕见孤本，浙江图书馆藏有一部清光绪三年影抄本）、《古今图书集成》（雍正年间铜活字本）、《通鉴纪事本末》（朝鲜大型铜活字本）、《二十一史》（明朝北京国子监刻本）、《诸家谥文类编》（明抄本、13 种）、《遁甲句解烟波钓叟歌》（孤本）、《奇门鸿宝》（明天启元年三色套印本）等。另有清代总管内务府档案稀世珍品“共计 2051 件，其中满文档案 861 件，主要是顺治、康熙年间。满汉合璧档案 1190 件，主要是雍正、乾隆年间。”。这些档案的每件题本上都钤记着“总管内务府”印，其中部分司院的题本也都钤记司院的印，而每一题本的封面左上方都配有红色的汉文或满文的批注。这些档案均属内务府秘籍，今已是海内外孤本，对今后研究有关清代的政治、历史、文化、经济具有宝贵的文献价值。

(二) 满铁日文文献的研究价值

1 相关日本问题研究的文献

现大连图书馆所藏满铁时期的日本语文献共 94115 种，179416 册，其中杂志 1906 种，22017 册，报纸 104 种。这些资料是当时日本人研究日本、中国以及东南亚的文献，包含文学、社会科学、历史、宗教哲学、产业、交通、地志、医学、艺术、军事等以及有关“满蒙文库”（中国东北地方文献研究）等资料。

而这些资料出版地都来自日本及殖民地台湾、朝鲜、日本殖民者在华所建立的各机关出版物。其中明治前的出版物有 3000 多种；满铁出版物有 4000 多种。

日本问题研究的资料 28000 多种，包括政治类 3000 余种、社会类 1500 余种、文化类 13000 多种、艺术类 1200 余种、文学类 8800 余种、历史类 1000 余种和教育类 1600 余种等，此外还有军事、经济方面的书籍及丛书之类。这些文献反映了日本明治维新后“大陆政策”政策思想导向，是策划实施“大东亚共荣圈”的基础数据。上述文献从多角度、多方位窥视到明治前后的日本政治、思想、经济、文学以及历史人物等各方面的发展与演变。如从日本文学方面的评论到丛集、史传、和歌、俳句、小说、戏曲等文献收集之广泛，到历史、传记、地志方面之全面（大连图书馆现藏书 9621 种，17150 册），这些文献精装、线装、平装都有。特别是明治维新后的反应战争题材的短篇小说，有 352 种，443 册。如《战争》、《战死》、《战火》等。有关历史中的战争类的文献，如甲午战争（84 种，92 册）、日俄战争（157 种，263 册）时期的文献等。这些文献是研究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重要资料。有关地志的文献多是日本人在大正与昭和时期所出版的文献，日本人研究中国山西、陕西、甘肃、青海、江苏、湖南、湖北、云南、福建等各地的地志风貌、游记、综览等，这些文献对研究“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在中国各地侵略的事实有一定的价值。

2. 相关中国问题研究与“满蒙文库”

为了称霸亚洲，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对中国和朝鲜推行扩张的政策。为了解和研究中国，日本殖民者鼓励“有志之士”，动员各类专业的博士、硕士以及在西方留学归来的专家学者，到中国研究各种问题。并在中国建立各行业的研究机关、调查所、出版社等。从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移民、交通、产业、地志等进行调查收集。并在日本、中国出版大量图书、报刊、数据汇编、文书、政府公文等文献，供更多的日本人研究满蒙以制定侵略方策。

“九一八事变”后，各满铁图书馆都设立“满蒙文库”，其在目录上特标有字母“M”。此文库现大连图书馆藏书 12052 种（1988 年统计，包括部分中文），其中日文藏书 8984 种 19345 册（大连图书馆 2002 年统计）。我们可以概括以下几个层面：（1）有关满蒙、中国文化以及宗教、历史、地志研究等文献；（2）有关满铁出版物；（3）有关政治、经济、法规、社会和移民等方面文献；（4）有关产业、理学和工学、交通铁路方面的文献。

满铁大连图书馆收藏的有关“满蒙文库”多为“东北地方文献”。这些文献的研究种类繁多，调查形式多样，细节详尽具体，对东北的每个省、市、县、旗，从历史、地志山川、城市、风貌、服饰、生活环境，甚至到水、石、花草等等相关文献研究具存，每个问题、每个侧面都有史料研究，考证很细致。“满蒙文库”为日本控制东北、东蒙、远东，探索其矿产、农业、渔业、文化、各种工业产品等（化学工业、纺织工业等）资源，提供珍贵的史料。所以，从这些资料中我们能发现许多有价值的数据，对我们今后研究日本殖民统治的侵略计划能得到许多实证。

3. 有关满铁文献出版物的情况

满铁大连图书馆收藏的满铁出版物有 4000 多种。其中包括图书、文书、档案、调查资料、各机关刊物、统计资料等各类文献。这些资料的发行是随着满铁在中国东北的势力不断扩张，调查范围不断地扩大。从满铁调查部几个时期的发展，可见满铁调查出版物的出世是随着局势的变化而变化的。

一是创立期（1907 年至 1922 年），为基础调查；二为满铁调查确立期（1923 年至 1931 年），主要是对北满、蒙古、苏联等地细密化的研究；三为“满洲事变”和经济会设立期（1931 年至 1935 年），随着关东军特务部的建立，“九一八事变”爆发，熟悉“满洲”的政治、经济成为日本殖民者的根本方针，满铁各部调动大量的专家，用 4 年时间立案调查 4000 余件；四为满铁产业部大陆开发期（1936 年至 1937 年）；五是日本殖民者进一步推行“大陆政策”期（1937 年夏“七七事变”爆发开始），向天津、北京、上海等地扩大调查机关，并建立“大东亚战争”调查部（1937 年以后）。为此先后建立新京支社调查局、铁道总局调查局、北支经济调查所、上海事务所调查室、东京支社调查室及东亚经济调查局、大连调查部（北方调查室、矿产地质调查室、社业调查室）等。甚至，满铁大连图书馆、满洲资源馆、奉天图书馆、哈尔滨图书馆都被列入调查部行列中，其共同使命“有效确实地达成建设大东亚共荣圈，加紧深入地对全东亚科学的综合的认识”，所以各调查机关出版了大量调查资料：如满铁经济调查会的《黑龙江流域调查报告》，北满经济调查会的《支那驻屯军乙嘱托（特约人员）矿山班第一班调查概报》、《哈市近郊农业调查报告》、《大兴安岭北铁西部线南部方面森林调查报告书》、《奉天近郊日本移民入植地域察调》，满铁调查会的《无锡电力调查报告》、《山西省矿业经营调查报告》、《北支矿山调查报告》、《满洲养鸡业调查报告》，满铁新京支社的《家畜交易市场调查》，满铁调查部的《满洲国水产贸易现状》，乙嘱托（特约人员）矿山班的《河北井陉煤田调查报告概要》，满铁北支经济调查所的《河北省顺义县沙井村土地所有权地籍及土地公证，有关水质调查》，支那驻屯军司令部的《白泥河镇状况》等。这些调查资料是极其重要的文献，都是以刻制的“油印本”向各有关机关、图书馆发放，一般称为“满铁调查资料报告”共 889 册。从中可以看到满铁的调查规模之大，从大的方面煤矿、森林、山川、地质、矿产资源等调查报告，小的方面从村、镇、水井、养鸡、麻袋等。这些不同行业、不同类别的详细调查资料是日本为其侵略中国，进行资源掠夺的依据。

（三）东亚问题的“远东文库”和“犹太文库”的探究

满铁大连图书馆所藏的西文图书 3 万册。这些文献不管是在版本和内容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包括中国各地区的舆图，年代多为明、清时期（共 1200 多种，5000 多幅，其中不乏珍品，以及碑帖拓片 1500 多种）。如《中国古地图》（明嘉靖年）、《太华山图》（石刻，明万历年）、南怀任编的《坤舆全图》（康熙十三年，此图为我国第一部全国地图集）、《北京城地图》、《潮州绘图》、《福州城图》等，展现了历史时期的山川、河流、经济、水利、风景、名胜、港口等有关疆域原始风貌。西文藏书包括英、德、法、荷、义、拉丁文等文献，对研究东亚问题，无论对学术研究还是版本价值均有重要意义。值得一提的是西文中以远东地区文献为主建立的“远东文库”（Far East Collection）和以犹太问题研究为主的“犹太文库”（Jewish Collection），主要是西方传教士到中国带来或传教时所著述的文献等。如：法国耶稣会士赫德（Du Haide）所著的《中华全志》（大连图书馆收藏的 1735 年巴黎出版和 1738 年伦敦二种版本），主要是他在中 国传教时所了解的中国政治、经济、法律制度、民族民情等方面记录；法国传教士冯秉正（Josepn de Mailla）着的《中国通史》（1777—1785 巴黎初版，共 13 卷）；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Martin）《中国历史》（1659 年阿姆斯特丹出版）；德国汉学泰斗基尔旭的《中国礼俗记》（1667 年阿姆斯特丹出版）。这些资料对

研究西方人中的中国现状是非常宝贵的一手数据。大连图书馆还收藏满铁大连图书馆的 3 万册俄文图书，是俄国人研究中国东北、西伯利亚的政治、经济、地理、军事、文学等方面的文献。

现在大连图书馆的“犹太文库”藏有犹太文献约 800 多种，1000 多册。“犹太文库”为满铁大连图书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提出向“满洲移植犹太难民，以借助犹太人的资金和智慧共同开发满洲的计划”。所以，日本情报机关对犹太人的研究投入大量的人力，设立“犹太问题研究厅”，派陆军省谍报人员安江宣弘到中东地区进行调查研究，认为“关于犹太人企图统治全世界的国际大阴谋的宣传，纯属一派胡言。”，如“犹太文库”中所收集的文献：书志类的《大百科全书》(1 至 10 册，1902—1931 年版，英文和德文版)、《犹太人共济社秘密组织之大百科全书》(英文，1920 年版)、杂志类德文《犹太人战争史档案》(1915 年)、《犹太生活与思想耶苏教会月刊》(1919 年)、《年青犹太人月刊》(1938 年)等，此外有宗教、哲学、教育、历史、经济、社会、工程等书。日本充分利用犹太人的智慧为其殖民侵略服务，是根本目的之所在。所以满铁调查部通过大量调查写出《满洲事变和犹太资本动向》等报告书，安江宣弘的《犹太国视察记》、《犹太人》和水谷国一《美国犹太人社会及其团体》等。满铁大连图书馆把这时期所收集、研究的有关部分犹太人的资料建立起“犹太文库”。

此外，有关满铁文献收藏中的“大谷文库”。大谷光瑞 (1876—1948 年)，是日本净土真宗本愿寺派第二十二世宗主法名为镜如。在西域探险所搜集的寄赠文献。现今馆所藏的“大谷文库”已响誉海内外，引起众多国际汉学界学者的关注，并给予高度评价。现在小说、戏剧、杂志等文献集中存放，其它文献按类别与大连图书馆图书混杂排列。

三 结语

以上综述，我们从“满铁”大连图书馆的藏书体系建立的过程，以及从其文献研究的价值方面来看，都称其为“殖民战争图书馆的产物”。但它的遗留与保存，为研究者提供了大量日本侵华时期的历史文献，具有很高的史证价值，以及对探究殖民政治、经济目的和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提供了较高的研究史料。所以满铁所经营的各图书馆，以满铁大连图书馆和奉天图书馆为中心，建立“满蒙文库”，作为对东北统治调查研究的重要机构；以沿线各个图书馆“民众图书馆”为辅，成为日本殖民文化渗透与宣传的“纵横文化网”。它的建立与经营、服务形式都与日本侵华战争的目的分不开。因此，满铁大连图书馆遗留下的文献作为日本掠夺来的中外文献的汇聚地，成为日本赖以制定侵华政策的情报资料中心。它不仅反映殖民历史文化的现象和实质，也看到日本侵华的野心，具有历史价值，亦承载着时代的价值。在每一册图书、每一本杂志、每一份调查报告的扉页上无不钦印着日本统治时期的文化侵略的鲜明印章，它将永远洗刷不去日本侵略者的侵略事实。

大连图书馆满铁文书解题

王小川*

—

大连图书馆是一所公共图书馆，国内的公共系统图书馆历来是由政府拨款、文化行政部门管理、新华书店统一配书的事业单位，因此在各馆名称之首，照例必须冠以所在行政区划的称谓，以明确隶属关系及馆藏覆盖区域。现存的 2800 所大、中型公共图书馆几乎无一例外地通称某省、某市或某县图书馆。然而，在众多馆中，准予破例者仅有北京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和大连图书馆等区区几家。北京图书馆（今已改）是国家图书馆，该馆以首冠中华的地位、囊括四海富藏天下的实力和服务国家最高层的功能而闻名内外，因此，当年馆名虽出体制之外，却在情理之中。南京图书馆是江苏省图书馆，该馆蕴涵金陵故都遗风和江南文化传承，变通其名，也早已为世人认可。大连图书馆自 1950 年由铁道部门移交以来即隶属于大连市，称旅大市图书馆（大连市图书馆），然而自上世纪 80 年代，馆藏满铁文书全面对外开放、又经中共中央书记处特批改扩建新馆之后，即变易馆名，径称“大连图书馆”。由此据实论名，北京图书馆并非北京市图书馆，南京图书馆亦非南京市图书馆，大连图书馆也非大连市的图书馆。

大连图书馆的名称之所以变例并得到认可，正是缘自该馆独特的历史背景、特殊时期的专类收藏和由此产生的无可替代的文献功能和文化影响力。这就要先说说“满铁文书”。

“满铁”的全称是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是当年日本政府设在我国东北地区的殖民经济政治统治先导机关，是日本军部势力在中国大陆实行殖民政治统治和军事独裁的经济基础和支柱；侵华战争爆发后，满铁社员又是伪满洲国、华北占领区经济组织中的骨干和重要成员。满铁前后“经营”40 年，其活动深深植根于我国的东北三省、内蒙古各地，广泛渗透于关内的华北、华中、华南广大地区，以及东南亚各国；满铁在欧美的大都市里均设有驻在机构，满铁调查机关与军部、外务省并列为日本海外 3 大情报系统。满铁的情报，在早期有效地指导日本国内官僚和民间资本一步步浸入中国大陆；战争爆发后，又成为日军战略行动的重要经济参考和政府制定国策的依据。当年，满铁在所辖铁路沿线建有 30 余所图书馆及分馆，大连图书馆的前身正是由满铁设立的、为会社经营建立系统、完整文献资料储备、隶属满铁调查部、并领有铁路沿线 30 余所分馆的中央图书馆，当时的名称是“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大连图书馆”。

满铁的“文书”是指满铁大连图书馆内收藏的图书、报刊和文件、档案，之所以称它作“文书”，而非藏书，是因为该收藏来源广泛、文种多样、用途专一、在形式上十分繁富庞杂，几乎包含当时所有用来记录文字、图形、符号的载体，其中除选订即时出版发行的中、日及欧美各国全部相关书籍报刊和收集到的有价值的古籍、文献外，更有相当数量的珍贵文件、档案，相比之下，这些文档分量

* 王小川，大连图书馆古籍部副研究馆员。

更重，价值也更高。满铁被取缔后，遗留在大连图书馆里的文书总数约有 35 余万册、件，正是藏有这批文书使大连图书馆更像一所划时代的档案馆、资料博物馆。我国公共系统图书馆收藏的主要渠道，历来多是旧籍传承和书店供配，品种单一，千馆一藏，而大连图书馆独揽宝藏，非它馆可比。满铁文书一经公开，内外轰动，扩建易名，势在必然。

二

坊间曾有一种说法，流布国内：大连图书馆所藏满铁文书系日本战败时旅顺苏联红军截留海外之物，然而实非如此，纯系满铁所为。满铁大连图书馆所藏文书从开张到收场搜集近 40 年，其来源广泛、渠道复杂，大体有照单订购、专款抢购、赠书、社内调拨、明抢暗拿和抄录数种。

照单订购。这是大连馆入藏图书、报刊的正式、常规渠道，首先它要收集中国大陆、本国出版商的即期订单，多个渠道掌握出版动态，然后出资订购。在日本，大连馆订有《图书馆杂志》、《东京堂月报》、内务省《纳书月报》、《书籍商组合月报》、文部省《推荐图书月报》。此外，《读卖新闻》、《朝日新闻》、《东京读书新闻》等重要报刊的书讯也经常参考；对已过发行周期的缺藏图书，国内部分，则通过《东京书籍组合月报》、《书籍商组合图书总目录》、《一诚堂古书籍目录》、《古本年鉴》、《日本古书通信》调查访求。丸善、若松堂、长门屋等书商的出版目录，也是大连馆补充国内缺藏的参考工具。入藏中国大陆关内中文书籍，《书香》杂志里常可见到“北京的出版界”、“北京学术出版界”、“上海的书店”等出版动态介绍，大连馆利用商务印书馆等重要书商定期发来的出版书目，东北地区则利用满洲文化协会《出版月报》补藏。

书商是大连馆订购书籍的直接中介者，曾经为大连馆代办订购业务的书商早期有：大阪屋号、金凤堂、千山阁、藤原文华堂、满书堂、三叶洋行；后期为：多以良、光文阁、右文堂、青年书局、字纸篓社、满洲文化协会等。出版商如商务印书馆定期直接寄发大连馆订书。

西文书则另有渠道，丸善书店大连支店由国内转道，协助大连馆选订西文图书。

满铁订购图书有个原则，凡是与“经营业务”相关的书刊，照单全收。而且，与其 1 种书购 10 册、分藏各处，不如 1 种书购 2 册，1 册全线流通，1 册固定收藏。大连馆是毗邻会社的中心馆、参考馆，自然成为单种图书的固定收藏地。至今，在大连图书馆满铁旧藏排架上，同种图书多仅限 2 册。

专款抢购。满铁对中国大陆的调查、经营既有政治、经济，同样包含文化，抢购文献典籍也在其中。满铁大连图书馆藏书建设时期，正是近代中国最动乱年月，典籍秘藏大量流散街面。早年，海源阁、嘉业堂珍藏，甚至文溯阁《四库全书》已然在满铁觊觎中，其后，又通过联合编目调查，基本摸透大陆典籍存世家底。满铁耳目，遍布各地，散乱转手消息一出，满铁即刻拨专款巨资，委派行家专员前往搞定，庞杂者，精挑细选；专藏者，鲸吞囊括。一时散亡孤本珍秘几近落入大连图书馆。

满铁大连图书馆历年先后购入专款图书主要有：沙俄后黑龙军管区俄文图书、苏联驻长春领事拉布罗夫藏书、意大利驻北京公使馆劳斯藏书、山东杨氏海源阁藏书、康有为及广东孔氏岳雪楼藏书，以及战争末期北京、长春、奉天流散

古籍。

赠书。赠书在大连馆例称“寄赠”，是大连馆入藏的又一渠道。日本人有将私人藏书赠送图书馆保存的习惯，赠者往往通过赠书表达某种心愿。官厅、军方、学校、科研机构、文化团体、银行、会社以及个人，都不时向大连馆赠书。当时，向大连馆赠书，意味着对满铁的支持，在重大事变关头，赠书量也会骤然增加。在大连馆接受赠书记录里，大谷光瑞之赠是必定要提到的，因为这是一笔数量大、体系完整、质量相当高的“寄赠”。

无偿交换也可算作变相“寄赠”。近代，日本在海外设有众多驻在机构，它们都将满铁视为大陆开发情报总汇，它们在当地编译的文档、报告，以无偿交换的形式源源不断发往大连馆，补充馆藏。

社内调拨。这又有正常接收和非常调拨。满铁规定：会社所辖内外部门、机构自行编印的出版物，包括书籍、报告、文件例应转交1份，留存大连图书馆。如此算来，40年间正常收入大连馆的满铁会社文档、出版物数量相当可观。非常调拨是满铁根据特定需要，强制合并和划拨内部特殊收藏。而这更是大连馆补藏的“专项利益”，其中，补充馆藏最力者莫过于总裁室早期文档划拨、奉天馆图书调拨和调查部资料课（资料室）合并。

明抢暗夺。这是满铁大连馆入藏时讳莫如深的渠道，当事人三缄其口，追述者语焉不详。当时一个流行说法被满铁大肆熏染：北京闹义和团，东交民巷所藏《永乐大典》等珍贵典籍被搬出垫路架炮。言外之意，为抢救、保护此类东方“文化财”，满铁责无旁贷。清末、民国间动荡战乱，天下典籍罹难、倾覆，始作俑者和获取最大利益者当首推日本，满铁身居大陆，执行日本政府殖民文化政策，旗下大连图书馆总是充当急先锋，战火余烬未消，每每闪现大连馆（还有奉天馆）专家、职员的身影。日俄战争中的文朔阁，“七七事变”时的清华园，“八一三”后的嘉业堂，南京政府官舍藏书地都可见满铁大连馆派员在指导、忙碌。如今，人们已很难确知其间有无、多少典籍文档秘密入藏大连馆，可嘉业堂所藏《永乐大典》明白白地“保护”在大连馆书架上。至于现在馆藏中那些沈阳、北京、华北等地宫廷、官府文件档案绝非订购、交换渠道所得入藏。

在大连图书馆里，还存有冯玉祥民军的“安民告示”、南京清真寺回民婚契、西安旅店账单等等杂件。这一类杂件的得来，也许是满铁调查人员外出时自己的存留，或顺手牵羊，我们暂且也把它们算作明抢暗夺吧。

转抄也算是大连馆一种补藏方式，在购不到、换不来、抢不得而又必欲得之时，只有出转抄下策，这是要花时日、出重金的。这一方式往往用在满、蒙文文献、文档上。

正是通过上述几种主要渠道和方式，40年间，满铁大连图书馆将与其“业务”相关的、在版、存世、遗留的文献囊括而归，迅速聚集起数十万册件体系完整、质量精良、科学适用的资料宝藏。

三

下面说说满铁大连馆收藏的变迁与现状。

满铁大连图书馆的收藏总量过往至今难有定数，百多年里，谋划、惦记、操作的人和方面太多，太杂。满铁时期，因“业务”需要，便利就近，满铁曾将批量入馆的俄文文献、古文医籍调拨哈尔滨（满铁苏联远东地区资料中心）、奉天

(满铁满洲医科大学);二战中,战况紧张,旅顺要塞司令部下令抽提馆藏地图;又将历年收集古刻珍秘、“贵重图书”集中装箱,转移出馆,随时准备运往安全、秘密处所;败战之际,满铁突击销毁馆藏绝密文档。苏军接管时期,苏联派员将整箱整箱的“贵重图书”席卷而北。建国后的调拨更加频繁,中央经济计划委员会调走“一五计划”用书;中国科学院、辽宁省选调原资料室调查文档;中央马列著作编译局抽调西文库藏;中科院近代史所再调馆藏边疆史地参考图书;其它零散调拨在所不计。历经上述几次大的变动,大连图书馆藏满铁文书尚存约 35 万册件。

上述变动,对原本品质精良、体系完备、科学适用的馆藏满铁文书无疑已伤筋动骨,珍秘、西文、文档等类更无异被剖析肢解。从文种看,俄文文献从此几尽空库;从学科分类上讲,医学古籍由此成为馆藏弱项;管内珍秘古刻、真正“贵重图书”从此消逝;西文库大类的缺残、中日文库随处可见的空号让人痛感“体无完肤”。当年极盛时的大连馆满铁文书今已分藏国内几大图书馆、档案馆,其概貌或许在先年编制的《中国馆藏满铁资料联合目录》中一窥端倪。

满铁文书是满铁集 40 年财力、人力、功力搜刮集成。大连馆曾经收藏有海源阁、嘉业堂等处宋元明精抄古刻。然而,满铁立社大陆,绝非为研究整理中华国故,而是肩负日本侵略扩张使命。满铁大连馆收藏此类镇馆宝籍为的加重本馆在业界内声望,确立满铁文化“开发”领袖地位。满铁的中心任务,是殖民占领、经济掠夺和情报的收集、提供。满铁大连馆文书中分量最重者,当属大陆史地调查研究书刊资料。珍贵古籍具有文物价值,大陆史地调查研究资料则具有更重要的实用价值。前者占馆藏不足百一、千一,后者则汗牛充栋。大连馆西文大库里充斥着古往今来西方列国商人、传教士、冒险家、学者们探访、调查、研究东亚大陆的报告、文献;满蒙文库里一色中国东北地区文献资料;中、日文书库所藏,囊括两国当代、各地重要出版物和搜罗到手的流散典籍、文档;一句话,大连馆藏已建成随时为国家军政高层决策的资料储备,一旦需要,满库文书即是制定详实计划、方案的一手参考。回望当年中日关系,每遇时局突变关头,满铁大连馆编订的资料专辑可同时、甚至提前摆在一线决策者案头。

大连图书馆历经沧桑变迁,残存满铁文书中,满蒙文库完整;中、日文书库整体完整;经过当年资料室三分余一后,所藏满铁调查报告复本和部分书刊补充入库;西文大库中留有远东文库、犹太文库等专类;大谷光瑞赠书中存有明清善本方志、小说;劳斯地图还在;尤其万幸的是报纸、刊物完好未动。骆驼虽残,骨架尚存,整理开发仍有可为。满铁设在大连,满铁文书存藏大连图书馆,无论它们如何被拆析,流散多远多久,大连馆始终是它们的“家”,无论从源起、脉络、魂魄、情感上看都是如此。

资料来源: 大连图书馆网《白云论坛》

中日美滿鐵史研究機構及學者概覽

許 勇

中国

胡 平

中国著名学者、作家，1982 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任南昌大学中文系当代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已出版作品 30 余种，500 余万字，其中《一百个理由——给日本也给中国》(2005 年) 和《情报日本》(2008 年) 均获学术界好评，前者还被《中华读书报》评为当年全国十佳图书之一，两书尤其后者有多节内容涉及满铁。

兰林友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著有《庙无寻处：华北满铁调查村落的人类学再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7 年)

陈鼎尹

台湾中山大学政治学研究所博士生，台湾中山大学中山学术研究所硕士，台湾清华大学经济学学士，著有「从王道乐土到中国研究的资料库——超越帝国主义的满铁」(From the Princely Land to a Data Bank-The SMR that Spills over Imperialism)、「满铁的中国经济研究资料流向分析」等。

李道新

湖北石首人，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影视艺术系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学博士，电影史学家，著有《中国电影史 1937-1945》、「沦陷的光影之《灿烂之满洲帝国》——“满铁”时事/文化映画中的“王道乐土”论述」等。

傅 波

辽宁省抚顺市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市社科院院长，曾以专家身份协助历史文献电视纪录片《带血的轨迹——满铁真相解密》(中共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与中央电视台第 10 频道联合创意策划) 的拍摄。

日本

满铁会

会长 松冈满寿男

副会长 崎山成见 植沢末吉

常务理事 滨地胜太郎(办公室主任) 天野博之(负责宣传)

简介：满铁会成立于 1946 年 2 月，是目前日本与满铁有关最大的民间社团，该会拥有自己的主页，并定期出版会刊《满铁会报》。

冈部牧夫 1941 ~ 2010.12.06

1941 年生，当代日本进步学者、自由撰稿人，对满铁历史问题较有研究，且观点鲜明。著有《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南满洲铁道会社研究》、《日本殖民地研究现状与课题》等。

伊藤一彦

宇都宫大学教授，著有「满铁研究进展及课题」等。

柳沢游

庆应义塾大学经济系教授，著有《满铁的调查与研究：「神话」与真相》、《庆应义塾图书馆「满铁」相关藏书介绍》、「满铁与大豆市场」等。

江田宪治

1955 年生，著有《满铁劳动史研究》等。

井村哲郎（イムラ テツオ Imura, Tetsuo）1943～

新潟大学人文社会·教育科学系教授，研究方向为日本及东洋史，日本研究满铁问题的知名学者，尤其是满铁资料研究专家。著有《满铁调查部与中国农村调查：天野元之助中国研究回顾》、《满铁调查部：相关人员的证言》、《旧满铁资料》（1~10）、「满铁与情报活动」等。井村哲郎在日本，被称作“图书馆管理员出身”的教授，他对中国态度友好，是新潟大学招收中国留学生较多的导师之一。

山口直树

日本兵库县人，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科学技术史和科学技术社会论，研究课题有满铁中央试验所的历史等。2008 年牵头创办北京日本人学术交流会。

小林英夫（こばやし ひでお）

1943 年 8 月 24 日生，日本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擅长东亚经济及殖民地经济史研究，现任早稻田大学教授。著有《「满洲」的历史》、《大东亚共荣圈的形成与崩溃》、《近代日本与满铁》、《满铁经济调查会史料》、《满铁——「智囊集团」的诞生与死亡》、《满铁调查部——「智囊先驱」的诞生与崩溃》、《满铁调查部轨迹：1907-1945》等。

泽井 实（SAWAI Minoru）1953～

大阪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研究科教授，研究领域为日本经济史、日本经营史和近代日本产业技术史。泽井实 1978 年毕业于国际基督教大学，1998 年获大阪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曾先后任教于东京大学、北星学园大学和大阪大学。著有《日本经营史》（有斐阁 1995 年）、《日本铁道车辆工业史》（日本经济评论社 1998 年）、《近代日本企业家的诸源流》（大阪大学出版会 1996 年）等。

原田胜正（Katsumasa Harada）1930～2008

著有《满铁》、《日本的铁道》、《铁道与文化》等。

山田豪一（Goichi Yamada）1936～

着有《满铁调查部：荣耀与挫折的 40 年》、《满洲国的鸦片专卖：「满蒙特殊权益」研究》等。

高桥泰隆（Yasutaka Takahashi たかはし やすたか）1946 年～

日本埼玉县人，玉川大学经营学系教授，经营学及历史学家，研究方向为经营史。高桥泰隆 1969 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商学系，1976 年修完该校商学研究专业博士课程，1995 年获早稻田商学博士学位，曾在大阪产业大学经济系任教。着有《日本殖民地铁道史论：台湾、朝鲜、满洲、华北、华中铁道经营史研究》（日本经济评论社 1995 年）、《昭和战争前期的农村与满洲移民》（吉川弘文馆 1997 年）等。

安富步（やすとみ あゆむ）1963～

日本经济学家，现任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1986 年京都大学经济系毕业，1991 年修完同校硕士课程，1997 年获京都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97 年任名古屋大学助理教授，2000 年任东京大学助理教授，2007 年任副教授，2009 年任教授。着有《「满洲」的成立》（安富步 深尾叶子 名古屋大学出版会 2009 年）、《「满洲国」的金融》（创文社 1997 年 该书获第 40 届日经经济图书文化奖）等。

松元俊郎（Toshiro Matsumoto）1952～

现任日本冈山大学社会文化科学研究所教授，研究方向为殖民地经济史和东洋经济史，研究课题有“「满洲国」经济与战后中国东北经济的连续性及间断性双层关系的研究”、“日、美国政府对战后中国东北经济及中国经济的评价的研究”等。

着有《侵略与开发：日本资本主义与中国殖民地化》、《从「满洲国」到新中国：由鞍山钢铁业看中国东北的重组过程 1940～1954》等。

松元俊郎 1975 年毕业于一桥大学社会学系，1977 年该校修完经济学硕士课程，1980 年完成该校博士课程，2001 年获一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历任冈山大学经济系讲师（1980 年）、助理教授（1984 年）、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非专职讲师（1987～1992 年）、冈山大学经济学系教授（1993 年）、冈山大学社会文化科学研究所教授（2006 年）等。

田中隆一（Ryuichi Tanaka）1967～

现任日本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副教授，研究领域有开发经济学、劳动经济学和应用计量经济学。2004 年获纽约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任大阪大学经济学研究科研究员（2004 年）、大阪大学社会经济研究所讲师（2004～2006 年）、东京工业大学信息工程学研究科副教授（2006～2011 年）等。着有《满洲国与日本的帝国统治》（有志舍 2007）等。

石堂清伦（Kiyotomo Ishido）1904～

着有《十五年战争与满铁调查部》（原书房 1986）等。

宫西义雄（Yoshio Miyanishi）1910～

着有《满铁调查部与尾崎秀实》（亚纪书房 1983）等。

草柳大藏（Kusayanagi Daizō）1924～

着有《实录满铁调查部》（朝日新闻社 1979）等。

加藤圣文（Kiyofumi Kato）1966～

爱知县人，日本历史学者，早稻田大学社会科学部毕业，同校文学研究科博士课程修了，现为国文学研究资料馆研究部助教，日本档案学会秘书长，东亚近代史学会常务理事。研究方向为日本近现代史、东亚国际关系史和记录资料学（档案学）。

着有《「大日本帝国」崩溃：东亚的 1945 年》（中央公论新社 2009）、《满铁全史：「国策公司」的全貌》（讲谈社 2006）、《近代日本与满铁》（小林英夫 加藤圣文 吉川弘文馆 2000 年）、《近代日本的形成与日中战争——战争社会史》（桧山幸夫 加藤圣文 雄山阁出版 2000 年）、《台湾总督府文件的史料学研究》（桧山幸夫 加藤圣文 ゆまに书房 2003 年）、《满铁经济调查会与南乡龙音——满洲国通货金融政策史料》（小林英夫 加藤圣文 社 南郷みどり 社会评论社 2004 年）、《旧殖民地图图书馆藏书目录 台湾篇全 9 卷 朝鲜篇全 14 国内国外补遗篇》（ゆまに书房 2001～2005 年）、「满洲移民计划的形成与“国策化”」（历史评论 2010 年）、「吉会铁路与满铁——满洲事变前间岛问题的定位」（《东北亚的国际关系与边境问题》2009 年）、「国策公司满铁的政治性」（增刊环 2006 年）、「满铁史研究与山崎元干文件」（近代中国研究汇报 2002 年）、「吉会铁路铺设问题——“满鲜一体化”的构图」（日本殖民地研究 1997 年）等。

松村高夫（まつむら たかお Takao Matsumura）1942～

日本经济学家，庆应义塾大学名誉教授，1969 年庆应义塾大学经济学博士课程修完，1976 年获英国华威大学（University of Warwick）社会史博士学位。2007 年任庆应义塾大学教授。

著有《满铁与中国劳工》（解学诗 松村高夫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年）、《满铁的调查与研究：「神话」与真相》（松村高夫，柳沢遊，江田憲治 編 青木书店 2008 年）、《15 年战争绝密资料集 第 29 集 731 部队制作资料》（田中明 松村高夫 编 不二出版 1991 年）《日本帝国主义下的殖民地劳动史》（不二出版 2007）、《满铁劳动史研究》（松村高夫 解学诗 江田宪治 编著 日本经济评论社 2002）等。

美国

马若孟（Ramon H. Myers）

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经济学博士，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荣誉资深研究员（Senior Fellow Emeritus），曾任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他所著的中国经济史 The Chinese Peasant Econom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及 The Chinese Economy, Past and Present (Wadsworth Press, 1978) 一直是学者必读的书目之一。

黄宗智（Philip C. C. Huang）

著名历史学家。普林斯顿大学学士，华盛顿大学博士。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历史系教授，1991 年晋升“超级教授”，2004 年荣休。中国研究中心创办主任（1986—1995 年）。《近代中国》季刊（Modern China）创办编辑（1975 年至今）。中国人民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

主要著作有：《法律、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中国研究的规范认识危机》、《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等。

杜赞奇（Prasenjit Duara）

历史学家、汉学家，印度裔，早年就学于印度，后去美国求学，拜汉学家孔飞力为师，现任教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学系及东亚语言文明系。代表作有《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 年的华北农村》、《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主权与真实性：满洲国与东亚现代进程》，其中《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获 1989 年度“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以及 1990 年度的“列文森奖”。

關夢覺、邵敬勛、蘇崇民教授簡介

许 勇

1 关梦觉教授及其著作

关梦觉（1912～1990），吉林怀德（今公主岭）人，满族，教授。1933年毕业于东北大学经济系。曾任北平《外交月报》编辑，武汉东北救亡总会宣传部副部长，河南大学副教授，嫩江省、黑龙江省教育厅厅长。1945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建国后，历任东北人民政府监察委员，吉林大学经济系主任、教授，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吉林省第四至六届政协副主席，民盟第五届中央常委、第六届中央副主席、吉林省委第七届主任委员，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是第三至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关梦觉教授是吉林大学经济学院的创始人，他开创了吉林大学经济学博士点。

主要著作：《地中海危机论》（关梦觉著 重庆时与潮社 民国 29 年）、《经济危机论初步》（关梦觉著 重庆生活书店 1940 年）、《美帝国主义简论》（关梦觉著 西满新华书店 1947 年）、《美国一千人》（关梦觉译 西北新华书店 1949 年）、《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关梦觉著 新中国书局 1949 年）、《英国经济问题的分析》（关梦觉译 世界知识社 1953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问题》（关梦觉编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57 年）、《中国原始资本积累问题初步探索》（关梦觉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问题》（关梦觉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60 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与美国经济危机》（关梦觉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61 年）、《关于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几个问题》（关梦觉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63 年）、《政治经济学疑难问题探讨》（关梦觉主编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陈云同志的经济思想》（关梦觉著 知识出版社 1984 年）、《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关梦觉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等。

2 邵敬勋教授及其著作

1949 年 6 月，邵敬勋任西北农学院院长（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1950 年 3 月至 1952 年 11 月，邵敬勋任东北财政专门学校（1950.3～1952.11 东北人民政府财政部创办）校长。1952 年 11 月 29 日，东北计划统计学院、东北财政专门学校、东北银行专门学校合并为东北财经学院，邵敬勋任教务长。

主要著作：「战时日本的石炭问题」（邵敬勋 中苏文化 1938 年第 1 卷抗战特刊第 4 期）、「国民经济史的对象和方法」（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 1957 年第 4 期）、「生产组织与生产管理也应属于生产力范畴」（社会科学战线 1979 年第 1 期）《近现代外国经济学说述要》（邵敬勋主编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3）等。

3 苏崇民教授及其著作

苏崇民，1931 年生，辽宁省新民县人，1953 年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生班毕业，现任吉林大学日本研究所教授，中国中日关系史研究会理事，东北地区中日关系史研究会副理事长，东北三省中国经济史学会副理事长，吉林省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长。

主要专著：

- ★ 《满铁史》 苏崇民 著 中华书局 1990 年
- ★ 《满铁史概述, 满铁史资料选辑》 长春 1981 年
- ★ 《劳工的血与泪》 苏崇民 李作权 姜璧洁 编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5 年
- ★ 《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史》 主编 陈本善 副主编 孙继武 陈贵宗 苏崇民 作者 陈本善 朱有为 孙继武 陈贵宗 苏崇民 吉林大学出版社 1989 年
- ★ 《满铁档案资料汇编》 解学诗 苏崇民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年
- ★ 《满铁史》 蘇崇民 著 山下睦南 和田正広 王勇 訳 葦書房 1999 年

主要论文:

- ☆ 满铁史概述 历史研究 1982 年 5 期
- ☆ A Brief History of the South Manchurian Railway Corporation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 1983 年 4 期
- ☆ 日本殖民地研究会 东北亚论坛 1994 年 2 期
- ☆ 关于东北沦陷史研究上的几个问题 东北亚论坛 1994 年 3 期
- ☆ 关于钓鱼岛问题的思考 现代日本经济 1995 年 Z1 期
- ☆ 关于东北沦陷区经济的研究中有待解决的问题 东北亚论坛 1997 年 3 期
- ☆ 满铁设立是日本经略中国大陆的重要开端 东北亚论坛 1998 年 4 期
- ☆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和战后的满铁史研究 东北亚论坛 1993 年 4 期
- ☆ 内田康哉与“九·一八”事变 现代日本经济 1986 年 6 期
- ☆ 关于 1907~1931 年满铁利润问题的探讨 现代日本经济 1987 年 2 期
- ☆ 伪满州国《北边振兴计划》初探 现代日本经济 1988 年 2 期
- ☆ 试论日伪统治时期东北殖民地经济的性质 现代日本经济 1989 年 2 期
- ☆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早期调查活动 (美) 杨觉舅 姜璧洁 苏崇民 吉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9 年 2 期
- ☆ 牢记中日战争的历史教训——黑羽清隆著《日中 15 年战争》评介 现代日本经济 1990 年 2 期
- ☆ 围绕满铁设立展开的中日交涉 现代日本经济 1990 年 5 期
- ☆ 满铁——侵略、掠夺中国东北的机构 现代日本经济 1991 年 2 期

参考文献: 百度百科、国图网、《满铁史》